

漢初楚國無郡論—— 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二

游逸飛*

本文首先據漢初楚國的政區沿革，確定北洞山與獅子山楚王陵為第一、二代楚王墓，時代屬於漢初。繼而指出漢初楚王陵見有兩百餘方中央與縣級官印，並未隨葬郡級官印、封泥，出土數千方漢初楚國封泥亦無郡級，這些現象並非偶然。排除諸種可能性後，漢初楚國無郡論應是目前漢初楚國未見郡級官印、封泥的最合理解釋。漢初諸侯王國有郡的歷史書寫，來自於漢廷的傳世文獻，只能反映諸侯王國始封的情況，不能反映諸侯王國之後的變遷。漢初諸侯王國或有郡、或無郡，必須嚴格檢討傳世與出土文獻的時代及地域性，才能得出更準確的結論。學界過去認為秦漢郡、縣普置於疆域之內，其實漢家天下或有郡、或無郡，只有縣乃普天之下共有。相較於封建制，郡縣制一般被視為有利於中央集權。然而漢初諸侯王國感到郡制無益於王國自身的中央集權時，廢郡之舉也就提上日程。雖然漢初諸侯王國廢郡、無郡只是局部、特殊的現象，但當郡縣化中央集權的歷史主流已幾成教條時，揭示廢郡、無郡的現象，探索當時的逆流、伏流，可能有助於我們反思郡縣制的本質並非中央集權的工具，郡縣制的發展亦可能走向地方分權。漢初楚國無郡論，所論雖小，卻可能帶給我們新的視野，重新理解秦漢地方政制的性質。

關鍵詞：郡縣制、諸侯王國、璽印封泥、徐州楚王陵、北洞山、獅子山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一、前言

自嚴耕望(1916-1996)首揭「郡國雙軌制」以來，漢初諸侯王國轄有數郡，隨著疆域日蹙、屬郡不斷被削，西漢中期以後王國內部政區不再置郡，但此時整個諸侯王國政制與疆域已略如一郡，成為現代學界的共識。¹由於缺乏史料探討漢初中央政府與諸侯王國置郡的差別，周振鶴研究漢初諸侯王國封域沿革，往往逕以漢郡為王國之郡展開探討，²惟其已提出漢之「齊郡」於高祖六年(201 B.C.)為悼惠王齊國內史，³顯然認為漢郡劃為諸侯王國疆域後可能改為內史，漢初郡制與王國郡制有所差別。馬孟龍進一步發揚此說，主張漢高祖十年(197 B.C.)「趙國、燕國、齊國、梁國、楚國、荊國都城所在之邯鄲郡、廣陽郡、臨淄郡、碭郡、彭城郡、吳郡皆應稱作內史」。又指出「淮南、長沙兩國行楚制，未必置有內史。但戰國時代，國都附近由中央直轄乃是列國的通例。淮南國、長沙國絕無設置九江守和長沙守之道理，即便兩國無內史之官職，也必有相應官員管轄畿輔地區」。故他繪製的漢高祖十年侯國分布圖，將上述漢廷諸郡均改稱各個諸侯王國的「內史」，進一步肯定漢初朝廷郡制與王國郡制的差別。⁴漢初諸侯王國與郡的關係似已不那麼單純。

若將時光倒流回到兩百年前，漢初諸侯王國與郡的關係乃當時第一流史家錢大昕(1728-1804)在其名著《廿二史考異》裡專門辨析的問題：

漢初諸侯王國，大率兼數郡之地。郡之屬王國者，郡名似元末

1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

2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

3 周振鶴，《漢書地理志匯釋》，頁 223。

4 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高祖十年侯國地理分布〉，頁 108-146。

嘗廢。齊悼惠王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后割齊之濟南郡封呂台、琅邪郡封劉澤，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景帝時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削楚之東海郡、趙之河間郡，皆郡之屬於國者也。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則諸侯王國之郡亦有守也。⁵

今日已窮盡漢初諸侯王國的傳世文獻的學者們或許會感到訝異：漢初諸侯王國轄郡、郡長官稱守這些似已清晰到毫無討論餘地的基本常識，竟是錢大昕孜孜探究的問題。究竟是乾嘉學者無知？抑或現代學者無知？重新檢討錢大昕的問題意識，有助於提醒我們漢初諸侯王國與郡的關係並不那麼單純，兩百年來史家根據傳世文獻所建構的圖象不一定是最正確的答案。只要帶著開放的立場重新思考漢初諸侯王國與郡的關係，就會發現漢初諸侯王國的出土文獻恰好站在傳世文獻的反面，錢大昕的問題在今天仍是問題，而且可以得出不同的解答——漢初某些諸侯王國無郡。

說有易，說無難。漢初某些諸侯王國是否真的無郡？傅斯年(1896-1950)曾云：

古史者，劫灰中之燼餘也。據此燼餘，若干輪廓有時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為不有，以或然為必然，既為邏輯之戒律，又蔽事實之概觀，誠不可以為術也。今日固當據可知者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然若以或然為必然，則自陷矣。⁶

「以不知為不有」，確為治史者應時時警惕之語。然而自錢大昕以降的學術史反映史家至今只能證明漢初某些諸侯王國有郡，實未證明漢初所有諸侯王國皆有郡。下文更將揭示文獻只能證明漢初某些諸侯王

⁵ 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附：三史拾遺、諸史拾遺)》，頁 58。

⁶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頁 300-301。

國僅在「某些時期」有郡，不能證明王國之郡存在於整個漢初。換言之，我們實「不知」漢初某些諸侯王國在某些時期是否有郡，逕行相信漢初所有諸侯王國有郡，同樣是「以不知為不有」，抹煞了諸侯王國無郡的可能性。歷史現象乃有無相生、虛實相應。史家研究歷史上某一時間與空間的「有」，其實也就暗示了歷史上某一時間與空間的「無」；否則「有」的特殊性難以彰顯，歷史研究的意義也就打了折扣。因此歷史上確實存在「不有」之事，亦具有研究價值。如何「據可知者」研究「不有」，將其「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實為治史者不可忽視的課題。

本文意欲繼承錢大昕的問題意識，重新反省漢初諸侯王國有郡的主流觀點，看似獨排眾議，故作驚人之語。其實漢初諸侯王國的特殊性早已為人所知，隨著出土史料的增加，近年學界對漢初諸侯王國特殊性的理解更加全面：漢初諸侯王國比擬漢廷，王國與漢廷之間有關津之禁，百姓和物資不得自由互通；⁷王國內部不受漢廷干涉，自行紀年、⁸自鑄貨幣、⁹自置丞相以下官

⁷《漢書·文帝紀》記載文帝十二年(168 B.C.)「除關無用傳」，可見在此之前漢廷與王國之間有關津之禁。見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卷4，〈文帝紀〉，頁123。具體規定可見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三為漢廷與王國百姓之間不得相互通婚之例。見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頁305-324、338-339。

⁸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2，〈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頁44-45。

⁹《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盜]鑄錢。」見司馬遷著，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顧頡剛等點校，《史記》，卷8，〈吳王濞列傳〉，頁380。蔣若是研究漢初楚王墓、梁王墓隨葬銅錢、吳國鑄錢遺址，指出王國鑄幣的特徵。然而漢初諸侯王國銅錢雖有其鑄造特徵，整體上仍與漢廷法定流通的銅錢大同小異。漢初

吏、¹⁰甚至可能自行制訂法律，¹¹儼然為獨立國家。故有學者強調漢初朝廷與諸侯王國是「國與國」的關係，諸侯王國並非漢廷地方政府，而是與漢廷「共天下」之國。¹²若充分重視漢初諸侯王國之特殊性的

雖在政制上復行周代封建，諸侯王國在貨幣上卻沿襲秦的半兩錢制，沒有復用先秦的刀、布諸幣，更未自創新錢。諸侯王國的銅錢大抵仍可流通於整個漢朝貨幣圈。見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秦漢半兩錢範斷代研究〉、〈論西漢四銖半兩錢〉，頁 19-92。另參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編，《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以下簡稱《北洞山報告》），頁 143-172；高震寰、蔡佩玲、張荭、林益德、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譯注〉，頁 295-352。黃錫全、安志敏則指出西漢早期的楚地墓葬，常有楚國金幣、仿金泥冥幣出現，說明楚國金幣沿用至漢初。漢初《二年律令》僅規定黃金的成色，並未規定黃金的形制。故楚地漢人很可能直接使用楚國金幣，並以泥質明器模仿楚國金幣。見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頁 336-354；安志敏，〈金版與金餅——楚、漢金幣及其有關問題〉，頁 61-90；安志敏、安家瑗，〈中國早期黃金製品的考古學研究〉，頁 291-310。

¹⁰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 2，〈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頁 37。

¹¹ 陳蘇鎮主張漢初諸侯王國可以自定法律，張忠燁則認為《二年律令》的施行地域及於諸侯王國，諸侯王國無權自定法律。揆諸漢初政治環境，諸侯王確實有自定法律的權力。但就像漢承秦律，諸侯王國可能只是在漢律的基礎上刪訂增補「符合國情」的律令，實質內容未必與漢廷律令（如《二年律令》）有太大區別。見陳蘇鎮，〈漢初王國制度考述〉，頁 27-40；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頁 83-94；張忠燁，〈《二年律令》的施行地域〉，頁 59-71；杉村伸二，〈二年律令より見た漢初における漢朝と諸侯王国〉，頁 21-40。

¹² 卜憲群，〈秦漢之際國家結構的演變——兼談張家山漢簡中漢與諸侯王國的關係〉，頁 285-323；阿部幸信，〈前漢時代における内外觀の変遷——印制の視点から〉，頁 121-140；阿部幸信，〈漢初「郡国制」再考〉，頁 53-80。然而考慮到「漢」才是天下的代表，亦不宜過分忽略諸侯王國的「地方性」。見王子今，《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漢朝」的發生——國家觀念的歷史考察〉、〈大漢·皇漢·強漢——漢代人的國家意識

這一脈絡，漢初諸侯王國有自己的地方行政制度，其郡制與中央漢廷的郡制有別，某些諸侯王國無郡的現象也就不令人意外。下文則以個案研究的形式，初步論證漢初某些諸侯王國在某些時期無郡。

二、漢初楚國無郡論的史料基礎

《漢書·楚元王傳》記載，漢高祖六年，劉交(?-178 B.C.)受封為第一代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又記載，景帝二年(155 B.C.)，第三代楚王劉戊(?-154 B.C.)服喪時通姦，被「削東海、薛郡」，三年(154 B.C.)正月遂響應吳王起兵，釀成七國之亂。¹³既然東海、薛、彭城三郡可封、可削，漢初楚國轄有東海、薛、彭城三郡，遂成為學界共識，向無學者質疑。然而，該則傳世文獻卻可能因出土文獻而有不同理解。

西漢劉姓楚國共 12 王，均葬於彭城(今江蘇徐州)。徐州考古至今已發現 8 處楚王陵。¹⁴已發掘者僅有獅子山與北洞山 2 座王陵隨葬官印、封泥。北洞山官印僅存 10 餘方，獅子山則出土超過 200 方官印、封泥。此外徐州土山二號漢墓(東漢彭城王墓)，其封土堆發掘出近 5,000 方漢初楚國封泥。三墓所出官印、封泥數量已過四位數、達五位數之半，卻仍不見東海、薛、彭城三郡的內容，與傳世文獻所載相悖，值得深究。然因獅子山與北洞山二墓的墓主、下葬時代尚有爭議，本節不得不先行探討二墓的斷代，以便深入分析材料。

及其歷史影響》，頁 391-420；游逸飛，〈西漢郡國雙軌制再探——官僚制與封建制的結合〉，頁 27-57。

¹³ 《漢書》，卷 36，〈楚元王傳〉，頁 1922-1924。

¹⁴ 相關論文多已收入徐州博物館編，《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較完整的整理與研究可參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劉尊志，《徐州漢墓與漢代社會研究》。

(一)楚王陵的年代

1. 獅子山墓主為第二代楚王劉郢客

獅子山發掘者指出，獅子山楚王陵形制偏早、隨葬半兩錢，時代當在武帝以前，當為前五代楚王之一。¹⁵由於第四代楚王劉禮(?-151B.C.)在位僅3年，且即位於七國之亂後，幾不可能興建規模宏大的獅子山王陵；學者又多據《水經注》記載及當地傳說，將楚王山王陵視為第一代楚王劉交墓。故無學者主張獅子山墓主是第一、四代楚王，爭論集中於二、三、五代楚王之間。

黃盛璋認為，獅子山墓主為第五代楚王劉道(?-129B.C.)，其主要理由為獅子山隨葬銅印「楚祠祀印」。《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景帝中元六年(144B.C.)「更名太祝為祠祀」，¹⁶故獅子山楚王陵下葬年代必在其後，才可能出土「祠祀」之印。西漢前期五代楚王中，只有第五代楚王劉道在位時間為景帝七年(150B.C.)至武帝元光六年(129B.C.)，符合獅子山的年代上限。¹⁷然而，已有不少學者指出，〈百官公卿表〉「詹事」亦有「祠祀」屬官，¹⁸且在景帝中元六年前便已設置。¹⁹「楚

¹⁵ 獅子山楚王陵考古發掘隊，〈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發掘簡報〉(以下簡稱〈獅子山簡報〉)，頁4-32；韋正、李虎仁、鄒厚本，〈江蘇徐州市獅子山西漢墓的發掘與收穫〉(以下簡稱〈獅子山收穫〉)，頁1-20。正式報告迄今未出。

¹⁶ 《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頁726。

¹⁷ 黃盛璋，〈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墓主與出土印章問題〉，頁69-78。

¹⁸ 《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頁734。

¹⁹ 梁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與墓主問題的再認識〉，頁78-82；劉瑞，〈獅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頁550-560。

祠祀印」不足以論證獅子山墓主為第五代楚王。隨著其他楚王陵的發掘與調查逐漸刊布，學者進一步指出，獅子山墓葬形制為西漢前期偏早，並無前期過渡至後期的特徵，其墓主若為第五代楚王，則時代過晚，不符合墓制的發展序列。²⁰如此一來，獅子山墓主就只可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楚王。

由於獅子山楚王陵規模宏大，但鑿建粗糙，墓道、耳室、後室等建築均有工程未完成的痕跡。耿建軍等學者遂主張墓主為第二代楚王劉郢客(?-175B.C.)，推測其在位僅 4 年，陵墓未完工便須下葬。²¹韋正等學者則主張墓主是第三代楚王劉戊，推測其參與七國之亂被誅，故未能完工。²²獅子山楚王陵考古發掘隊則持兩可之說。²³

隨著更多相關考古資料的披露與研究，獅子山墓主的爭議露出曙光。耿建軍全面分析徐州楚王陵的開鑿時間與工作量，指出獅子山楚王陵的開鑿時間應為 5 年左右，劉戊在位長達 20 年，陵墓理應早已完工；劉郢客在位僅 4 年，恰恰符合獅子山王陵工程將完未完的情況。²⁴梁勇指出參與七國之亂的宛朐侯劉執(?-154B.C.)，未以玉衣隨葬，²⁵應是懲

20 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漢墓年代與墓主探討〉，頁 81-89；劉瑞，〈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墓主考〉，頁 537-550。

21 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劉照建、張浩林，〈徐州獅子山漢墓墓主考略〉，頁 26-30；劉瑞，〈獅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頁 550-560。

22 〈獅子山收穫〉，頁 1-20；趙平安，〈對獅子山楚王陵所出土印章封泥的再認識〉，頁 52-55；宋治民，〈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的兩個問題〉，頁 22-28；韋正，〈江蘇徐州市獅子山西漢墓墓主的再認識〉，頁 86-92；李春雷、李紅，〈徐州獅子山漢墓墓主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頁 29-33、82。

23 見〈獅子山簡報〉，頁 4-32。

24 耿建軍，〈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墓開鑿時間考析〉，頁 73-77。

25 孟強、耿建軍，〈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執墓〉，頁 4-21。

罰叛亂之故；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玉衣，馱籃山楚王陵未出，²⁶可見馱籃山墓主才是參與七國之亂的第三代楚王劉戊，獅子山墓主則是第二代楚王劉郢客。其後劉瑞、劉尊志等人的綜合研究均同意獅子山墓主為第二代楚王之說。²⁷此說大抵成為當今考古學界的共識，爭訟近十年的獅子山楚王陵墓主大抵定讞。

2. 北洞山墓主為第一代楚王劉交

《北洞山報告》主張，墓主為第五代楚王劉道，下葬時間約為武帝元光六年。²⁸然而學界一般認為北洞山王陵形制較早，不應晚至此時，故此說乏人支持。北洞山墓主既早於第五代楚王，又因楚王山公認是第一代楚王劉交墓，獅子山目前被認定為第二代楚王劉郢客墓，馱籃山王陵葬制特殊，被認為是第三代楚王劉戊墓，北洞山便只可能是第四代楚王劉禮墓，學者多持此說，²⁹又以劉尊志論證最力。³⁰然而北洞山王陵形制頗為特殊，部分學者認為其時代更早：如葛明宇在獅子山墓主尚未確定前，主張北洞山墓主為第二代楚王；³¹劉瑞甚至根

²⁶ 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馱籃山西漢墓〉，頁 173-174。

²⁷ 劉瑞，〈獅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頁 550-560；劉尊志，〈徐州兩漢諸侯王墓研究〉，頁 57-98。較早的綜合討論可參冉如波、陳海霞，〈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其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頁 58-64。

²⁸ 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徐州北洞山西漢墓發掘簡報〉，頁 2-18；《北洞山報告》，頁 174-180。

²⁹ 趙平安，〈對獅子山楚王陵所出土印章封泥的再認識〉，頁 52-55；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黃盛璋，〈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墓主與出土印章問題〉，頁 69-78；劉照建、邊策，〈也談北洞山西漢楚王墓的墓主和時代〉，頁 59-62。

³⁰ 劉尊志，〈徐州兩漢諸侯王墓研究〉，頁 57-98。

³¹ 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漢墓年代與墓主探討〉，頁 81-89。

據最新的楚王山勘查報告，³²指出楚王山漢墓的形制為西漢後期，與第一代楚王的時代不合，北洞山墓主才是第一代楚王。³³劉瑞與劉尊志分別從墓葬形制、隨葬器物、出土錢幣、印文風格等角度全面分析北洞山的時代，但最後的結論卻南轅北轍，北洞山墓主究竟是第一代還是第四代楚王？根據現有的考古材料似乎難有定論。

其實黃展岳早已指出楚王山尚無科學考古發掘，斷代難以討論，不宜簡單視為第一代楚王墓。³⁴鄒厚本、³⁵劉濤亦有相同看法。³⁶劉瑞根據較新、較全面的考古資料，獨排眾議、主張北洞山墓主是第一代楚王，看似大膽，實則更為嚴謹。近年徐州當地學者劉照建披露較多楚王山一號墓的發掘資料，指出楚王山隨葬西漢晚期的青釉瓷器，從而肯定劉瑞之說。³⁷可見以楚王山是第一代楚王墓為前提，排除北洞山墓主為前三代楚王的可能，甚至遽定為第四代楚王的推測並不嚴謹。

由於北洞山的斷代並未定讞，學者不應以考古學斷代為前提，解釋出土材料；反而應透過其他方法探討出土材料，提供斷代證據。下文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分析北洞山官印的地望及郡界，便有助於肯定北洞山墓主是第一代楚王。

北洞山楚王陵曾遭盜掘，隨葬地方官印僅見虹、凌、蕭、彭、山

32 劉照建、梁勇，〈徐州市銅山縣楚王山漢墓群考古調查〉，頁 247-254。

33 劉瑞，〈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墓主考〉，頁 537-550。

34 黃展岳，〈漢代諸侯王墓論述〉，頁 310-338。

35 其意見並未發表，僅見韋正，〈江蘇徐州市獅子山西漢墓墓主的再認識〉，頁 86-92。

36 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變〉，頁 172-193。

37 劉照建，〈徐州楚王山漢墓時代和墓主考〉，頁 6-18。葛明宇近撰新文，亦披露了部分發掘資料，但遠不如劉照建詳細，甚至未提及出土了西漢晚期的青釉瓷器。故其主張楚王山為第一代楚王墓、北洞山為第二代、獅子山為第三代的意見，並不可靠。見葛明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墓主為劉戊考〉，頁 71-80。

桑、穀陽、襄賁、繒、蘭陵 9 個縣道國邑。劉尊志論證北洞山墓主為第四代楚王時，完全未提北洞山隨葬官印的研究。然而，學者普遍同意楚王隨葬官印反映了楚王死前的統治疆域，因此北洞山官印所見 9 個地名位處何郡之地，應有助於北洞山楚王陵的斷代，不應忽視。周振鶴早年全面復原西漢諸侯王國政區沿革，至今猶不可易；³⁸鄭宗賢近年根據新出土資料，對漢初楚國政區的復原更加細密。³⁹根據他們的復原，可將上述 9 個地名製為表 1(並見圖 1)：

表 1 北洞山隨葬官印所見郡縣位置

縣道國邑名	漢初所在郡(擬)
虹	楚內史(原彭城郡)
蕭	
山桑	
穀陽	
凌	東海郡
彭	
襄賁	
繒	
蘭陵	

除了彭，其餘 8 地均見於《漢書·地理志》，⁴⁰地望、屬郡甚明。《北洞山報告》認為，「彭」即彭城縣，⁴¹然而獅子山出土「彭城丞印」封泥，可見彭城不應省作「彭」，其說不確。鄭宗賢指出，武帝時封城陽頃王子偃為「彭侯」，在東海郡內，當即北洞山的彭地。高祖八年(199 B.C.)曾封陳賀(?-180 B.C.)為「彭侯」，當亦為此地。其具體地

³⁸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

³⁹ 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1-67。

⁴⁰ 虹、蕭、山桑、穀陽見於沛郡，凌見於泗水國，襄賁、繒、蘭陵見於東海郡。《漢書》，卷 28 上，〈地理志〉，頁 1572、1588、1638。

⁴¹ 《北洞山報告》，頁 115。

望則引清人王榮商(1852-?)之說,⁴²主張在東海郡費縣的祊亭。因為《說文解字》云:「祊,繫或從方。」⁴³說明「祊」可通「繫」,「繫」又通「彭」,彭地應該就是祊亭,在費縣一帶。⁴⁴故北洞山官印所見 9 地地望均可考,漢初 4 地在楚內史、5 地在東海郡,北洞山墓主生前至少統治楚內史與東海郡之地。第三代楚王因漢廷欲削東海、薛郡,而響應吳國,引發七國之亂;亂平之後,楚國僅轄楚內史(即彭城郡)之地,眾所皆知。因此疆域擁有東海郡的北洞山墓主不可能是第三代以降的楚王(劉戊、劉禮、劉道),只能是前兩代楚王。既然獅子山墓主已確定為第二代楚王,北洞山墓主便只能是第一代楚王。

表 2 漢初劉姓楚王表

世代	姓名	在位年代	年數	疆域	陵墓
一	劉交	高祖六年至呂后元年 / 六年 (201-187 / 182 B.C.)	15 / 20	彭城、薛、東海	北洞山
		呂后二年 / 七年至文帝元年 (186 / 181-179 B.C.)	8 / 3	彭城、東海	
二	劉郢客	文帝二年至五年 (178-175 B.C.)	4	彭城、薛、東海	獅子山
三	劉戊	文帝六年至景帝三年 (174-154 B.C.)	21	彭城、薛、東海	馱藍山
四	劉禮	景帝四年至六年 (153-151 B.C.)	3	彭城	
五	劉道	景帝七年至元光六年 (150-129 B.C.)	22	彭城	

北洞山僅隨葬位於楚內史與東海郡之地的官印,卻沒有位於薛郡之地的官印,值得分析。綜觀漢初楚國政區的沿革,可分為四階段(參

42 王榮商,《漢書補注》,卷 5,頁 49。

43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 1,頁 4。王榮商引作「祊亦作繫」,不確;鄭宗賢引用時亦未訂正。見王榮商,《漢書補注》,卷 5,頁 49;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17-19。

44 唯武帝時的彭侯國是裂城陽王國之土以封城陽王子,說明彭原屬城陽國。城陽國又是裂齊國之土以封,故彭可能曾屬齊國。彭地位處齊、楚邊境,漢初郡國邊界變遷頻繁,彭何時屬楚、何時屬齊、何時屬城陽?其沿革難以詳考。此問題承鄭威私下提示。

表 2)：第一，漢高祖至惠帝時楚國受封薛、東海、彭城三郡；第二，呂后時漢廷分割楚國薛郡之地以封建魯國，楚國僅存內史與東海郡之地；第三，文帝元年(179 B.C.)至景帝七國之亂前，魯國被廢，楚國重新轄有薛郡，恢復三郡之地；第四，七國之亂後，楚國被削薛、東海二郡，僅餘楚內史之地。

北洞山無薛郡之地官印的現象僅與第二階段的疆域相契合，可見北洞山官印反映的是第二階段的疆域；而第二階段的楚王只有第一代，恰恰符合上文對墓主的推定。由此可見，若將北洞山官印反映的地望置於漢初楚國政區沿革與楚王世系的脈絡之中，便可推斷北洞山墓主只能是第一代楚王，解決考古學懸而未決的問題。透過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交互辯證，歷史學有可能解決考古學上的難題，兩門學問各擅勝場，上古史研究必須跨學科。

本文主張北洞山楚王陵墓主是第一代楚王劉交，其時代早於七國之亂，與部分學者的意見牴觸。對於主張北洞山楚王陵時代晚於七國之亂的三種理由，略加批判如下。

第一，《北洞山報告》主張隨葬官印是楚國故縣官吏為故主賻贈之物。⁴⁵以官印為故主助喪之制前所未聞，此說純為臆測。何況東海、薛郡削於第三代楚王劉戊之時，楚國故縣官吏的故主只有叛亂者劉戊，而非報告所主張的第五代楚王，報告實難自圓其說。

第二，藤田勝久認為北洞山官印反映的楚國疆域比獅子山狹小，僅止於楚內史周邊的範圍，獅子山反映的是七國之亂前的楚國疆域，北洞山則反映七國之亂後的楚國疆域。⁴⁶其實仔細復原北洞山官印反

⁴⁵ 《北洞山報告》，頁 184-185。

⁴⁶ 藤田勝久，〈《史記》與漢代諸侯王——《張家山漢簡·秩律》與徐州楚王陵印章封泥〉，頁 475-484；〈張家山漢簡〈秩律〉と漢王朝の領域〉，頁 1-32。

映的疆域便可知當時楚國疆域雖小，仍包含東海郡，不可能在削薛、東海郡的七國之亂後。

第三，鄭宗賢注意到北洞山疆域包含東海郡，然而他秉信部分考古學者對北洞山楚王陵的斷代，⁴⁷故認為北洞山官印反映的是七國之亂後的楚國疆域，進而提出兩種可能：其一，七國亂後楚國的東海郡並未被漢廷收奪；其二，由於北洞山官印地望均不濱海，漢廷可能僅收奪郟縣以東至海的區域。這兩種可能均為彌縫之說，既與傳世文獻矛盾，又無其他證據，並不可取。

本節對楚王陵斷代的考辨，證實北洞山楚王陵是第一代楚王墓，獅子山楚王陵是第二代楚王墓，二墓隨葬官印、封泥反映的楚國官制與疆域符合兩代楚王卒年：文帝元年與文帝五年(175 B.C.)，其時代屬於漢初，是漢初楚國無郡論的一手史料。

(二) 楚國出土官印、封泥整理

我曾於 2010 年 7 月至徐州市博物館、漢兵馬俑博物館，瀏覽館藏的大量楚王陵隨葬官印、封泥，心裡慢慢滋生疑問：為何楚王陵有那麼多中央官印、縣級官印，卻沒有郡級官印？回臺灣蒐集相關研究，唯見湯其領指出此現象，並進而推測漢初楚國無郡。⁴⁸此說與我想法不謀而合，但要想證明「漢初楚國無郡論」這一奠基於默證的大膽推論，則非湯其領不到十頁的短文可以完成，因而我決定蒐集更全面的材料，進行更縝密的研究。

⁴⁷ 其觀點游移，既於〈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一文接受北洞山楚王為第五代楚王劉道之說，卻又於同文後接受第四代楚王劉禮之說。見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30、50、65-66。

⁴⁸ 湯其領，〈漢初楚王國官印與職官探蹟〉，頁 75-79。

本節整理漢初楚國出土官印、封泥，先按出土地點分成北洞山、獅子山、土山三小節，再照形制分銀印、銅印、封泥三類，最後依內容分為中央官吏與地方官吏兩部分，並探討地方封泥的地望。

1. 北洞山隨葬官印

北洞山曾遭盜掘，僅出土 13 方官印，未出封泥(表 3、4)。官印皆為銅質，印文未重複。⁴⁹

表 3 北洞山隨葬中央銅印

印文	數量
楚武庫印	1
楚御府印	1
楚邸	1
楚宮司丞	1
共 4 種	共 4 方

表 3 反映的官制可考如下：武庫、御府均見於頒布於漢初的張家山漢簡〈秩律〉，⁵⁰與反映西漢晚期官制的〈百官公卿表〉；⁵¹邸當即〈百官公卿表〉的「國邸」；⁵²宮司丞應即秦封泥「宮司空丞」之省。⁵³漢代

49 《北洞山報告》，頁 114-116。

50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簡 461，頁 270。

51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1-732。

52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0。

53 王輝、程學華，《秦文字集證》，頁 177。傳臨淄劉家寨出土漢初齊國封泥有「齊宮司空」、「齊宮司長」、「齊宮司丞」，後兩者應皆省「空」字，見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3780-3818，頁 158-160。《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漢初齊國有「北宮司空」，見《史記》，卷 105，〈扁鵲倉公列傳〉，頁 2804。

秩級六百石的官吏佩帶銅印，〈秩律〉簡 461 記載漢初武庫、御府秩六百石，出土銅質的武庫、御府官印，合乎規定。四官均承襲秦漢官制。

表 4 北洞山隨葬地方銅印

印文	數量
虹之左尉	1
凌之左尉	1
蕭之左尉	1
彭之右尉	1
山桑丞印	1
穀陽丞印	1
襄賁丞印	1
繒丞	1
蘭陵丞印	1
共 9 種	共 9 方

表 4 反映的疆域，上文已考證，此處不贅。

2. 獅子山隨葬官印、封泥

獅子山隨葬官印、封泥最初僅公布部分資料，且有所牴牾。⁵⁴後來耿建軍刊布資料更為完整，但仍不全。⁵⁵《大漢楚王》則發表了部分官印、封泥的彩色照片。⁵⁶劉瑞企圖比較已刊布的各種印章鈐印本，找出同一種印章的不同鈐印本，藉此確定該種印章的數量在兩枚以上。其文雖有全面考證的雄心，仍不免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慨歎。⁵⁷近

54 〈獅子山簡報〉，頁 4-32；王愷，〈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頁 44-47；〈獅子山收穫〉，頁 1-20。

55 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

56 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編，《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

57 劉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封泥考釋〉，頁 425-436。

年徐州市博物館館長李銀德刊布了獅子山所有隨葬官印、封泥的種類與數量。⁵⁸本節以李銀德提供的資料為主，並補充我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到徐州市博物館庫房考察實物及文物保管簿籍時的收穫，探討獅子山隨葬的 168 方官印(另有碎印 68 塊，至少可綴合成 11 方)與 85 方封泥(另有若干碎塊)。

(1) 銀印

獅子山楚王陵曾遭盜掘，考古發掘不見金印出土，銀印所剩甚少(表 5)。留存銀印均為武官印，一方楚都尉印出於 W4(甬道西側第一間耳室)。⁵⁹

表 5 獅子山隨葬銀印

印文	數量
楚都尉印	4
楚騎尉印	1
共 2 種	共 5 方

表 5 反映的官制可考如下：〈秩律〉簡 440 有二千石的「備塞都尉」，⁶⁰〈百官公卿表〉有「護軍都尉」、「關都尉」等各種都尉，⁶¹疑漢初楚國中央亦設有數個都尉，但職稱尚未分化，故隨葬複數官印。〈秩律〉簡 440 有二千石的「車騎尉」，⁶²〈百官公卿表〉有「騎都尉」，⁶³應與漢初楚國「騎尉」有關。漢代秩級二千石的官吏佩帶銀

⁵⁸ 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

⁵⁹ 李銀德將該楚都尉印記為銅印，當誤。見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12。

⁶⁰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40，頁 258。

⁶¹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7、742。

⁶²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40，頁 258。

⁶³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27、738。

印，漢初都尉、騎尉秩級大抵均為二千石，出土銀質的都尉、騎尉官印，合乎規定。楚國兩官均承襲漢廷官制。

(2) 銅印

獅子山楚王陵殘存超過 150 方銅印，數量龐大，埋藏時空完全一致，是本文以有推無，提出「漢初楚國無郡論」的關鍵史料(表 6、7)。銅印多出土於盜洞及甬道，當為盜墓賊棄置；少數出土於 W4(甬道西側第一間耳室)，應即原先放置官印之處，發掘者推測為儲藏室；「食官監印」出於 PM(外墓道東壁下陪葬墓)，陪葬墓墓主當為食官監；⁶⁴「北平邑印」出於後室，⁶⁵或因北平邑乃獅子山墓主之父第一代楚王劉交的陵邑，地位非同一般。

表 6 獅子山隨葬中央銅印

印文	數量
楚太僕丞	1
楚太史印	1
楚祠祀印	2
楚衛士印	1
楚大行印	1
楚太倉印	1
楚御府印	1
楚永巷印	1
永巷丞印	1
楚 ^食 官印	2
食官監印	1
楚中司馬	1
楚司馬印	30

⁶⁴ 〈獅子山簡報〉，頁 4-32。

⁶⁵ 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12。

楚營司馬	2
楚中司空	3
楚營司空	5
楚輕車印	1
楚中候印	4
楚候之印	77
楚騎千人	9
共 20 種	共 145 方

表 6 反映的官制可考如下：御府已見於北洞山銅印，太僕、⁶⁶太史、祠祀、⁶⁷大行、⁶⁸太倉、永巷、⁶⁹食官、輕車、中候，⁷⁰均見於〈秩律〉與〈百官公卿表〉；⁷¹司馬為〈百官公卿表〉中尉、衛尉的屬官，⁷²〈秩律〉簡 468+444、449 則有衛將軍司馬、衛尉司馬、公車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盜賊關司馬諸官，⁷³疑楚國中央亦設有多名司馬，但名稱未分化，故所見隨葬官印達 30 枚；候既為〈百官公卿表〉中尉、典屬國的屬官，⁷⁴又有〈秩律〉的衛將軍候、衛尉候，⁷⁵疑楚國中央亦

⁶⁶ 武帝時改王國太僕為僕，《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41。

⁶⁷ 此應為詹事之祠祀，奉常之太祝改名祠祀，時在景帝六年(151 B.C.)，遠晚於獅子山墓主第二代楚王劉郢客的卒年(175 B.C.)，見《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26、734。

⁶⁸ 武帝時為典客屬官，見《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0。

⁶⁹ 武帝太初元年(104 B.C.)改永巷為掖庭，見《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2。

⁷⁰ 中候為中尉、將作少府屬官，不只一名，故隨葬 4 枚以上官印。

⁷¹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40、445-446、449、460-463、467，頁 258、262-263、270、291；《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26、729-734、738。

⁷²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28、732。

⁷³ 簡 468「備盜賊關司馬」的釋文由洪尚毅釋出，見洪尚毅，〈漢代的塞尉與城尉——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西北邊塞漢簡為中心〉，頁 23-27。

⁷⁴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2、735。

⁷⁵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46，頁 263。

有「候」官多名，但名稱未分化，故所見隨葬官印達 77 枚；食官監即〈秩律〉「食監」；⁷⁶中司馬、中司空、騎千人見於〈秩律〉；⁷⁷衛士見於〈百官公卿表〉；⁷⁸營司馬見於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⁷⁹西漢官印見有「監營司馬」；⁸⁰營司空不見於文獻。漢代秩級千石至六百石的官吏佩帶銅印，〈秩律〉記載漢初衛將軍司馬、衛尉司馬、公車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盜賊關司馬秩千石，太僕丞、⁸¹太倉、中司空、輕車秩八百石，太史、祠祀、永巷、中候秩六百石，出土銅質官印，合乎規定。以上諸官大抵均承襲漢廷官制。

表 7 反映的疆域可考如下(並製為圖 2)：蘭陵、穀陽、蕭、繒 4 地亦見於北洞山，上文已有考述。除了北平與海邑，剩餘 10 地均見於《漢書·地理志》，⁸²地望、屬郡大抵清晰。唯承在〈地理志〉雖屬東海郡，但其前身為魯國析出的王子侯國，⁸³漢初應屬薛郡。獅子山新見 12 個地名，加上北洞山的 9 個地名，出土資料所見漢初楚國縣道國邑已達 21 處。下文對北平、海邑、彭城、文陽 4 處較有爭議的地名略加考證。

76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67，頁 291。

77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45-446、468，頁 262-263、291。

78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28。

79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頁 207。

80 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編號 159，頁 30。

81 據〈秩律〉，簡 444，「兩千石官丞，六百石」。見游逸飛，〈《二年律令·秩律》簡 444「二千石口丞」應釋作「二千石官丞」〉，網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79，瀏覽日期：2013 年 8 月 14 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郡吏補考〉，頁 261-271。

82 相、符離、山桑、穀陽見於沛郡，武原、彭城見於楚國，承、朐、下邳見於東海郡，僮見於臨淮郡，卞、文陽(即汶陽)見於魯國。《漢書》，卷 28 上，〈卷名〉，頁 1572、1588-1589、1637-1638。

83 《漢書》，卷 15 下，〈王子侯表〉，頁 498。

表 7 獅子山隨葬地方銅印

印文	數量
北平邑印	1
蕭邑之印 ⁸⁴	1
武原之印	1
蘭陵之印	1
穀陽之印	1
穀陽丞印 ⁸⁵	1
承令之印	1
相令之印	1
僮令之印	1
胸之右尉 ⁸⁶	1

84 此從李銀德之說；耿建軍與《大漢楚王》將之歸類於封泥；〈獅子山收穫〉未收錄「蕭邑之印」，只收錄「蕭令之印」。參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中國國家博物館等編，《大漢楚王》，頁 77；〈獅子山收穫〉，頁 1-20。我至庫房核對，證實李銀德披露的資料無誤。

85 鄭宗賢認為此印為北洞山之銅印，獅子山未出此印，耿建軍等學者披露資料時誤植於獅子山。參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1-67。比對耿建軍(圖 7-1)與《北洞山報告》(圖 7-2)公布的鈐印本，四字筆畫的長短、粗細、結構皆有一定差異，實為兩方不同的印章。我至庫房核對，證實獅子山隨葬銅印有「穀陽丞印」。

86 王愷所據鈐印本見圖 7-3，於圖版說明釋為「昭之右尉」、正文釋為「胸之左尉」；韋正、耿建軍所據鈐印本印文完全相同之圖 7-4，兩者應為同一方銅印，但改釋為「胸之右尉」，其釋可從；李銀德所公布的資料中，「胸之右尉」與「昭之右尉」並存，但未公布新的鈐印本或照片，似說明存在另一方銅印「昭之右尉」。見王愷，〈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頁 44-47；韋正，〈從出土印章封泥談漢初楚國屬縣〉，頁 75-80；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我至庫房核對，證實獅子山隨葬銅印只有「胸之右尉」一方銅印，韋正、耿建軍披露的資料正確，李銀德應是不慎沿襲王愷之誤，未注意到

海邑左尉	1
繼之右尉	1
卞之右尉 ⁸⁷	1
文陽丞印	1
文[陽]之印	1
下邳丞印	1
符離丞印	1
彭城丞印	1
共 18 種	共 18 方

關於北平，黃盛璋注意到龜山楚王陵第六代楚王劉注(?-115 B.C.)隨葬銅器有「北平園」之名，⁸⁸推測見於獅子山銅印的「北平邑」也是陵寢園邑。既然獅子山墓主是第二代楚王，隨葬陵邑印便只能是第一代楚王陵邑之印。⁸⁹北平邑當在劉交陵墓(今日的徐州楚王山)之旁，也就

兩者實為同一銅印。

⁸⁷ 鈐印本為圖 7-5，〈獅子山收穫〉將印文第一字釋為「卞」，王愷釋為「共」，黃盛璋釋為「其」。該字字形應即「𠂔」字的變體，《說文解字》：「𠂔，或寃字」，段玉裁指出「寃」即「卞」之古文，因此該字可釋作「卞」，獅子山收穫的釋讀可從。參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 8 下，頁 406；〈獅子山收穫〉，頁 1-20；王愷，〈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頁 44-47；黃盛璋，〈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墓主與出土印章問題〉，頁 69-78。

⁸⁸ 南京博物院，〈銅山小龜山漢崖洞墓〉，頁 21-35。

⁸⁹ 黃盛璋當年主張獅子山墓主是第五代楚王，故未能證明北平邑為第一代楚王陵邑之說。鄭宗賢主張北平陵邑的世代不明，則未充分考慮獅子山墓主是第二代楚王的意義。李銀德近年根據土山漢墓出土封泥「楚文園長」、「楚夷園印」，主張楚國陵園是根據楚王諡號命名，北平邑不一定是楚王陵邑。其說值得重視，但漢代帝王生前便開始經營帝王陵，當此之時有陵邑而無諡號，陵邑應另有他名，以諡號命名陵邑、陵園只能是死後之事，且可能與原名並用，原名不一定被取代。參黃盛璋，〈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墓主與出土印章問題〉，頁 69-78；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1-61；李銀德，〈徐州西漢楚王陵墓考古的發現與收穫〉，頁 3-12。

是當時首都彭城附近，位於楚內史之地。「北平邑印」反映楚國擁有自置縣邑的權力，是漢初楚國擁有廢郡權力的旁證。

黃盛璋推測，海邑即東海郡的海西縣，現存秦漢官印、封泥並無海西之名，只見數方海邑丞印，⁹⁰本文暫從其說。

「彭城丞印」看似有彭城縣丞與彭城郡丞兩種可能，但因彭城郡應改為楚內史，該印只能是彭城縣丞之印。

至於「文[陽]之印」，耿建軍首次公布時釋為「□□之印」(圖 7-6)，劉瑞從之，鄭宗賢釋為「交□之印」，李銀德表格釋作「□丞之印」、正文釋作「□邑之印」。⁹¹鄭宗賢釋第一字為「交」，推測為《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呂后封以呂產的侯國「郊」、⁹²《漢書·地理志》沛郡的「洌」侯國，⁹³該地在漢初亦屬楚內史。惟該字不似「交」字(如《說文解字》的「𠂔」、⁹⁴睡虎地秦簡的「𠂔」⁹⁵)。出土封泥「郊侯邑丞」(圖 7-7)的「郊」之左旁，⁹⁶實與該字形體有別。該字筆畫與獅子山銅印「文陽丞印」的「文」字(圖 7-8)甚似，唯下方多出兩筆。我至庫房目驗實物，該印第二字被利器切除／剪去，第一字下方兩筆明顯較淺，與印文有清楚區別，應是第二字被切除／剪去時，利器不慎觸及第一字所致。排除下方多出的兩筆，該印印文第一字無疑是「文」字，只是拓本無

⁹⁰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1610，頁 271；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3285，頁 137。

⁹¹ 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劉瑞，〈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墓主考〉，頁 537-550；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1-61；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

⁹² 《史記》，卷 19，〈惠景間侯者年表〉，頁 980。

⁹³ 《漢書》，卷 28 上，〈地理志〉，頁 1572。

⁹⁴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 10 下，頁 494。

⁹⁵ 張守中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61。

⁹⁶ 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3324，頁 139。

法呈現「文」字與下方兩筆的深淺區別，只有目驗實物或高畫質照片時可分辨，今作示意圖如圖 7-9。該印第二字殘缺過甚，本應闕釋。然而官印文字的規律性很強，我們可根據完整官印的文例推測殘損官印的內容。獅子山隨葬官印、封泥，以「文」開頭者僅見「文陽丞印」，「文」應指地名；第二字若補作「文陽」的「陽」字，該印文即為「文[陽]之印」，亦符合「武原之印」、「蘭陵之印」、「穀陽之印」等官署印詞例。故本文將該印印文釋為「文[陽]之印」。⁹⁷

(2) 封泥

表 8 獅子山隨葬中央封泥

印文	數量
楚中尉印 ⁹⁸	18 ⁹⁹
楚內史印 ¹⁰⁰	1
楚太史印	1
楚太倉印	1
庫印(圖 7-10) ¹⁰¹	1

⁹⁷ 我至庫房考察，發現「文[陽]之印」在簿籍上誤植為「北□之印」，而簿籍上並無其他「北□之印」，獅子山現存隨葬品亦不見「北□之印」的官印或封泥。李銀德首次刊布「北□之印」，顯為誤信簿籍之故。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

⁹⁸ 王愷歸類為銅印，李銀德歸類為封泥，《大漢楚王》收有「楚中尉印」封泥照片。參王愷，〈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頁 44-47；中國國家博物館等編，《大漢楚王》，頁 77；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我至庫房核對，確定「楚中尉印」只有封泥。

⁹⁹ 我至庫房核對，確認「楚中尉印」封泥 17 方出於 W1，1 方出於甬道。

¹⁰⁰ 李銀德表格作「內史之印」銅印，但所附鈐印本為「楚內史印」封泥。見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我至庫房核對，確認獅子山確未出土「內史之印」官印或封泥，只有出土「楚內史印」封泥。

¹⁰¹ 圖 7-10 照片出自耿建軍，其釋文原作「庫□□□」，李銀德改釋為「庫□

□□廚印 ¹⁰²	2
共 6 種	共 24 方

表 8 裡的楚中尉印、楚內史印、楚太倉印、庫印出於 W1(內墓道西側南耳室)。¹⁰³W1 應為府庫，故隨葬器物由中尉、內史、太倉、庫等中央官吏封緘。□□廚印出於 E4(甬道東側第二間耳室)。¹⁰⁴

表 8 反映的官制可考如下：太倉、太史已見獅子山銅印，中尉、內史均見於〈秩律〉與〈百官公卿表〉；¹⁰⁵庫見於〈秩律〉，¹⁰⁶〈百官公卿表〉將作少府屬官有石庫；¹⁰⁷廚之考辨見本文註釋 102。以上諸官大抵見於漢廷官制。

□印」。見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圖版(圖 7-10)「庫」下殘畫確似「印」之上端。然而「庫□□印」的文字釋讀順序當為右上→左上→左下→右下，但獅子山官印封泥文字未見此種讀序，其讀序皆為：右上→右下→左上→左下；且封泥甚殘，照片上完全看不見其他兩字，我至庫房目驗實物，「庫印」二字左方確無文字，僅有被封泥匣擠壓出的泥土，該封泥應是由半通印「庫印」鈐印而成，並無□□二字。

¹⁰² 未公布照片、拓本。〈秩律〉有長安廚長，〈百官公卿表〉內史屬官有長安廚令，頗疑封泥頭兩字可補為彭城，作「彭城廚印」，為楚內史屬官。參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65-466，頁 290；《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4。

¹⁰³ 耿建軍公布「庫印」封泥照片時，註明其器物編號為 W1:22；然而簡報圖七公布 W1 平面圖時，編號 22 之器物為「楚中尉印」封泥。見〈獅子山簡報〉，頁 4-32；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我至庫房核對簿籍，W1:22 為「楚中尉印」封泥，並非「庫印」封泥。

¹⁰⁴ 〈獅子山簡報〉，頁 4-32。

¹⁰⁵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40，頁 258；《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2、736。

¹⁰⁶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71，頁 293。

¹⁰⁷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33。

表 9 獅子山隨葬地方封泥

印文	數量	出土位置
蘭陵之印	1	E1
蘭陵丞印 ¹⁰⁸	2	E1
蕭□□□ ¹⁰⁹	1	E1
蕭丞之印	6	E1
下邳丞印	10	E1
呂丞之印	16	E1
符離丞印	6	E1
彭城丞印	18	W2
相令之印	1	W2
共 9 種	共 61 方	

表 9 地方封泥均出於 E1(內墓道東側南耳室)與 W2(內墓道西側北耳室)，前者為庖廚間，後者為貯藏間。發掘者推測兩耳室的隨葬品主要為楚國屬縣的進貢物品，封泥為封緘貢物之用。¹¹⁰

地方封泥所見之地多與上述 21 處縣道國邑重複，唯呂未見，已見漢初楚國的縣道國邑數目達 22。呂見於《漢書·地理志》楚國，¹¹¹漢初應屬楚內史。

¹⁰⁸ 李銀德正文未列，但該文圖版 5 便是「蘭陵丞印」封泥，發掘簡報、上述諸學者亦常論及「蘭陵丞印」封泥。〈獅子山簡報〉，頁 4-32；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我至庫房核對，確認「蘭陵丞印」封泥確為獅子山隨葬品。

¹⁰⁹ 李銀德正文記載了「蕭□□□」與「蕭丞之印」封泥，但表格僅見「蕭邑之印」與「蕭丞之印」封泥。見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我至庫房核對，確認獅子山並未出土「蕭邑之印」封泥，表格的「蕭邑之印」為「蕭□□□」之誤。

¹¹⁰ 〈獅子山簡報〉，頁 4-32。

¹¹¹ 《漢書》，卷 28 上，〈地理志〉，頁 1638。

表 10 獅子山隨葬官印、封泥所見郡縣位置

縣道國邑名	漢初所在郡(擬)
彭城	楚內史
呂	
武原	
北平	
穀陽	
相	
蕭	
符離	
僮	
蘭陵	東海郡
朐	
下邳	
繒	
海邑	
承	薛郡
文陽	
卞	

獅子山官印、封泥所見 17 地地望大致可考，9 地在楚內史、5 地在東海郡、3 地在薛郡，反映獅子山墓主生前至少轄有楚內史、東海郡與薛郡之地，符合第二代楚王的統治疆域，亦符合考古學者對獅子山墓主時代及身分的判斷(表 10、圖 3)。

3. 土山漢墓出土封泥

土山二號漢墓為東漢彭城王墓。1982 年調查時，發現並徵集到 22 方封泥，時代定為東漢；¹¹² 2004 年正式發掘時，在封土堆裡找到 4,500 餘方封泥，學者重新研判這批封泥應為西漢初年楚國官署所拋棄，不

¹¹² 李銀德，〈徐州土山東漢墓出土封泥考略〉，頁 75-80。

知何故最後被埋入東漢彭城王墓的封土。考古發掘出土的土山封泥絕大部分現藏於徐州博物館，李銀德已公布了一小部分。¹¹³唯其甫發掘時，已有一部分封泥流入民間，部分為楊廣泰收藏並刊布。¹¹⁴土山封泥雖非漢初楚王隨葬品，卻是漢初楚國官署處理文書的遺存，亦足反映楚國當時的政區規劃，更可與隨葬品互補。土山封泥有中央與縣級，未見郡級，¹¹⁵與北洞山、獅子山相同；土山封泥尚見鄉級與私印兩類，此為北洞山、獅子山未見。表 11、12 僅整理中央與縣級封泥。

表 11 土山出土中央封泥¹¹⁶

印文	數量	出處
楚中尉印	2	徐 1 / 新 1
楚內史印	4	徐 1 / 新 3
內史省印	6	徐 3 ¹¹⁷ / 新 3
楚御史丞	1	徐
楚□史丞 ¹¹⁸	1	徐
楚郎中丞	1	徐
楚衛士丞	1	徐
楚宮司丞	7	徐 1 / 新 6
楚太宰印	1	徐
楚食官丞	2	新

¹¹³ 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

¹¹⁴ 見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

¹¹⁵ 雖然目前公布的土山封泥只是一小部分，但我至徐州市博物館考察，李銀德館長透露他全面整理土山封泥時，並未見到郡級封泥；2014 年 3 月 1 日徐州市博物館研究員呂健來信，亦指出同樣情況。

¹¹⁶ 表中封泥出處，李銀德稱「徐」、楊廣泰稱「新」。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頁 116-118。

¹¹⁷ 該文指出土山封泥 3 方「內史省印」，均加鈐私印，均不相同，其中之一為「陳固」，其餘 2 方未公布，官印加私印的現象反映漢初楚國內史省中的官員眾多，進一步區分各自的文書行政責任。

¹¹⁸ 第二字疑為「御」或「內」。

楚食官印	1	徐
楚祠祀印	1	徐
楚后祠祀	1	徐
楚大祝印	1	徐
楚文園長	1	徐
楚夷園印	1	徐
楚□輕 ¹¹⁹	1	徐
□侯□印 ¹²⁰	1	徐
楚□僕 ¹²¹	1	徐
楚中廕印	1	徐
楚中廕丞	1	徐
楚內官印	1	徐
楚內官丞	3	徐 1 / 新 2
楚宦□□ ¹²²	1	徐
□宦者長 ¹²³	1	徐
中官	1	徐
司空	3	新
司空之印	1	徐
少內	1	徐
倉印	1	徐
庫印	3	徐 1 / 新 2
□庫 ¹²⁴	1	徐
左市	2	新
廕印	1	新
傳舍	1	徐
共 35 種	共 58 方 ¹²⁵	

¹¹⁹ 第二字或為「左」或「右」，第四字疑為「車」。

¹²⁰ 或即「楚侯之印」。

¹²¹ 第二字疑為「大」或「中」，無論太僕或中僕，都是掌管楚王家車馬的長官。

¹²² 第三字疑為「者」。

¹²³ 原文疑為「楚宦者長」。

¹²⁴ 第一字疑為「左」或「右」。

¹²⁵ 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一文公布數十種土山封泥，僅「內史省印」有 3 方，其餘都只有 1 方。由於土山封泥尚未整理完畢，目前公布的數量顯非實際數量，各種封泥應當均有重複者未公布。

表 11 反映的官制可考如下：中尉、內史、祠祀、宮司丞、食官、庫已如前述，御史見於《二年律令》與〈百官公卿表〉；¹²⁶御史丞、¹²⁷郎中丞、¹²⁸太宰、太祝、內官、內官丞、宦者長、¹²⁹司空、倉均見於〈秩律〉與〈百官公卿表〉；¹³⁰中廩、中廩丞、少內見於〈秩律〉簡 450；¹³¹衛士丞、¹³²食官丞、¹³³園長，¹³⁴見於〈百官公卿表〉；¹³⁵中官見於《漢書·呂后紀》；¹³⁶內史設省前所未見；后祠祀不見於文獻，或指皇后之祠祀；左市見於西漢中晚期封泥；¹³⁷傳舍見於西漢早期官印。¹³⁸以上諸官大抵仍承襲漢廷官制。

¹²⁶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賜律〉，簡 296，頁 212；《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25。御史不見於〈秩律〉，是因為漢初御史無秩，見閻步克，〈若干「比秩」官職考述〉，頁 408-432。

¹²⁷ 〈秩律〉原文作「御史」，似脫重文號，《二年律令與奏讞書》補為「御史[丞]」，可從。見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259。

¹²⁸ 即郎中令之丞。

¹²⁹ 如宦者令。

¹³⁰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簡 440-441、461-463、468、471，頁 258-259、270、291、293；《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25-727、730-731、734。

¹³¹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264。

¹³² 即衛士令之丞。

¹³³ 即食官令之丞。

¹³⁴ 如園令。

¹³⁵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26、728、734。

¹³⁶ 《漢書》，卷 3，〈呂后紀〉，頁 100。

¹³⁷ 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1313，頁 202。

¹³⁸ 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1319-1321，頁 202。

表 12 土山出土縣級封泥¹³⁹

印文	數量	出處
彭城之印	1	《新出》
彭城右尉	2	〈土山〉1 / 《新出》1
彭城左尉	1	《新出》
彭城丞印	14	〈土山〉2 / 〈徐州〉1 / 《新出》11
彭城獄丞	1	〈徐州〉
彭城□丞 ¹⁴⁰	1	新
彭城□□	1	土
北平邑印	1	徐
□平□印 ¹⁴¹	1	徐
萬春邑印	1	徐
萬春□□	1	新
蕭邑之印	1	徐
蕭令之印	1	徐
蕭丞之印	2	徐 1 / 新 1
蕭□□印 ¹⁴²	1	徐
城侯邑印 ¹⁴³	1	徐
山桑左尉	1	徐
下邳丞印	1	徐
下蔡丞印	1	徐
向丞之印	1	徐
呂丞	1	新
呂丞之印	2	新
宛朐邑印	1	徐
承丞之印	1	徐
東陽丞印	1	徐

¹³⁹ 表中封泥出處引自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者稱「徐」；引自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者稱「新」；引自李銀德，〈徐州土山東漢墓出土封泥考略〉者稱「土」。

¹⁴⁰ 第三字疑為「獄」。

¹⁴¹ 疑即「北平邑印」。

¹⁴² 第三字或為「之」。

¹⁴³ 「侯」原釋作「候」，當誤。

相丞之印	1	徐
相右丞印	1	徐
符離丞印	2	徐 1 / 新 1
新豐丞印	1	徐
僮丞之印	1	徐
蒙□之印	1	徐
穀陽之印	1	徐
□陽邑丞 ¹⁴⁴	1	徐
薛丞之印	2	新
薛□之印 ¹⁴⁵	1	徐
蘄丞之印	1	徐
蘄□之印 ¹⁴⁶	1	徐
□縣□丞印 ¹⁴⁷	1	徐
共 38 種	共 56 方	

扣除與上文重複者，表 12 封泥新見萬春、城、下蔡、向、宛朐、東陽、新豐、蒙□、薛、蘄 10 地。除了萬春地望不明，其餘可分楚國境內與境外兩類略考如下。

下蔡、向、蘄見於《漢書·地理志》沛郡，漢初屬楚內史；薛見於《地理志》魯國，漢初屬薛郡；「城」通「成」，高祖六年封董樸為成侯，¹⁴⁸當即此「城侯邑印」之「城」，即《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之成縣，¹⁴⁹漢初或屬薛郡。¹⁵⁰以上 5 地屬楚國，出土資料所見漢初

¹⁴⁴ 第一字或為「穀」或「東」。

¹⁴⁵ 第二字疑為「丞」或「令」。

¹⁴⁶ 第二字疑為「丞」或「令」。

¹⁴⁷ 李銀德指出武帝太初元年將印章字數改為 5 字，可見該印的時代在西漢中期以後。土山封泥的時代跨度較大，大部分雖為漢初，少部分則晚至西漢中期以後，然未見新莽封泥。見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22-23。

¹⁴⁸ 《漢書》，卷 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頁 551。

¹⁴⁹ 范曄、司馬彪著，李賢等注，《後漢書》，志第 21，〈郡國志〉，頁 3454。

¹⁵⁰ 此承馬孟龍私下提示。

楚國縣道國邑已達 27 處。《史記·荊燕世家》記載第一代楚王劉交「王淮西三十六城」，¹⁵¹殆非虛語。

東陽見於〈地理志〉臨淮郡，漢初應屬吳國；新豐見於〈地理志〉京兆尹，漢初屬漢內史；宛朐邑即冤句縣，見於〈地理志〉濟陰郡，漢初屬梁國或碭郡，徐州簸箕山漢墓隨葬「宛朐侯執」金印，亦證漢初為侯國；¹⁵²蒙□或即蒙陰，見於〈地理志〉泰山郡，漢初應屬齊國。以上 4 地不屬楚國，反映了漢初楚國與漢郡及其他諸侯王國的文書行政。

土山封泥所見 20 地中，不屬楚國者 5，位於楚內史者 12，東海郡 2、薛郡 2，大抵合於漢初楚國疆域(表 13、圖 4)。¹⁵³

表 13 土山出土封泥反映的郡縣位置

縣道國邑名	漢初所在郡(擬)
彭城	楚內史
呂	
山桑	
北平	
穀陽	
相	
蕭	
符離	
僮	
向	

¹⁵¹ 《史記》，卷 51，〈荊燕世家〉，頁 1993。

¹⁵² 孟強、耿建軍，〈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執墓〉，頁 4-21。

¹⁵³ 惟屬東海郡之地的官印、封泥在北洞山超過一半，在獅子山佔三分之一，相較之下，土山封泥的東海郡之地比例明顯偏低。土山四字印封泥時代雖可定為漢初，但出有「楚文園長」、「楚夷園印」等帶有第二代、第四代楚王諡號的封泥，說明部分封泥已晚至第三代甚至第五代楚王之後。土山封泥罕見東海郡、薛郡之地，或因不少封泥的時代晚於北洞山、獅子山楚王陵，東海郡、薛郡已非楚國所轄，文書往來較少之故。此說須待土山封泥完整公布後，方可驗證。

廩	東海郡
下蔡	
下邳	
承	薛郡
薛	
城	
東陽	臨淮郡
新豐	漢內史
宛朐	梁國或陽郡
蒙□(蒙陰?)	齊國

三、無郡級官印、封泥是否等於無郡？

前文較全面考訂、分類漢初楚國出土官印、封泥，北洞山、獅子山、土山現存官印 53 種、181 方，封泥 88 種、199 方，加上土山漢墓未刊布的近 5,000 方封泥，數量不可謂不眾、種類不可謂不繁，不管是象徵死後世界的隨葬官印，還是用於現實世界而遺留的封泥，都呈現出漢初楚國僅有中央官署與官吏、縣級官署與官吏，獨無郡級官署與官吏的奇特現象。然而漢代有郡、漢初諸侯王國轄郡可謂中國史的基本常識，要想根據漢初楚國無郡級官印、封泥的默證，證成「漢初楚國無郡論」，尚須更深入檢討史料。由於北洞山楚王陵盜掘過甚、土山漢墓資料的斷代不夠精確，下文將分類討論出土資訊相對豐富的 55 種、253 方獅子山楚王陵隨葬官印、封泥。

(一)水運要衝——封泥所反映的物資運輸實態

獅子山楚王陵隨葬封泥與相關器物同出於耳室，未受盜擾。目前所見 9 種、61 方縣級封泥，應與原先隨葬地方封泥的種類與數量相距不遠。縣級封泥見有蘭陵、相、下邳、呂、符離、彭城、蕭 7 地，可

製為表 14 及圖 5。

表 14 獅子山隨葬縣級封泥統計表

地名	彭城	呂	下邳	蕭	符離	蘭陵	相
數量	18	16	10	8	6	3	1

於焉我們可以發現 7 地皆在楚國首都彭城周邊，多少反映漢初楚國的水道交通網。首都彭城位於穀水與泗水匯流處，封泥數量最多；蕭傍穀水，位於彭城上游；呂、下邳傍泗水，位於彭城下游；4 地連成一氣，共見 52 方封泥，佔全部縣級封泥的 84%，反映橫貫楚國中部的穀、泗水運之興盛。位於彭城以南的符離、相兩地，傍睢水，或許反映楚國南部透過睢水水運與中部往來。彭城以北的蘭陵，旁有祠水，¹⁵⁴注入泗水，與楚國中部的往來亦便。¹⁵⁵

由上可知封泥反映的地點均為漢初楚國的交通要衝，發掘者推測封泥的功用為緘封貢品，¹⁵⁶有一定道理。但封泥所見 7 地僅佔楚國縣級政區的一小部分(楚國初封時達 36 縣，獅子山銅印亦見 16 地)，上貢的義務不應僅限於上述 7 地。封泥反映的只是首都周邊的縣級政區運輸物資至楚王陵墓。運輸的物資是貢品、賦稅抑或轉輸，非封泥所能解答。

¹⁵⁴ 《漢書·地理志》作「祠水」，《水經注》作「桐水」，王先謙認為酈道元因二字形近致誤，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仍沿《水經注》。今從《漢書·地理志》。見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頁 2477；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2 冊，頁 19-20。

¹⁵⁵ 鄭威根據水系、交通分析東海郡城邑的變遷，指出郯縣雖為東海郡郡治，但下邳位於沂水、泗水交會之處，水路交通更為發達，從西漢到東漢，下邳的重要性逐漸增加，最終成為下邳國國治，與郯縣並駕齊驅。參鄭威，〈西漢東海郡的轄域變遷與城邑分布〉，頁 171-188。我認為獅子山封泥可能反映蘭陵、下邳對漢初楚國北部經濟、交通的重要性，郯縣被選為東海郡郡治，主要的考量或許是軍事、政治因素。

¹⁵⁶ 〈獅子山簡報〉，頁 4-32。

彭城、呂、蕭、符離、相 5 地屬於楚內史，本可直接運輸物資至中央；但蘭陵、下邳兩地原屬東海郡，其直接運輸物資至中央的現象，是否暗示東海郡並不存在，兩地亦屬楚內史呢？這一推論顯然並不恰當，為了節省運輸時間與成本，即使是屬於郡的縣級政區，仍可直接運輸物資至中央，不須透過郡治轉輸。¹⁵⁷因此獅子山隨葬中央與縣級封泥，獨闕郡級封泥，雖是可信的歷史現象，卻不能據以推論楚國無郡。

(二)盜掘子遺——從漢初官制論郡守、郡尉等銀印之闕

獅子山隨葬官印僅有少數出土於 W4 耳室(貯藏室)，大多數出土於墓門塞石一帶，顯係盜墓賊棄置。但官印出土數量仍在 200 方以上，且種類繁多，故考古學者將楚王隨葬的屬下官印稱為「百官藏」，認為隨葬官印乃地下楚國政府與疆域的象徵，宣示了楚王的統治權力。¹⁵⁸

楚王陵官印的形制與質量均與正式官印無殊，不宜視為「貌而不用」的明器；¹⁵⁹即使稱作明器，亦為完全按照正式官印仿作的「複製

¹⁵⁷ 大櫛敦弘探討居延漢簡所見的陸路運輸，亦以縣為單位。大櫛敦弘，〈秦漢國家の陸運組織に關する一考察——居延漢簡の事例の検討から〉，頁 23-43；藤田勝久，〈漢代の漕運事業と郡県社会〉，頁 340-378。

¹⁵⁸ 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頁 381-391。

¹⁵⁹ 主張獅子山隨葬官印為明器之說以李銀德為代表，其說重點有四：第一，內史、中尉、太僕應用銀印，獅子山所出為銅印，故為明器。第二，楚都尉印有四，楚國不應有四個都尉同時存在，故為明器。第三，楚騎尉可能是楚國自設，秩級不高，應為「秩比二千石」或更低，使用銅印，故銀印「楚騎尉印」可能是明器。第四，漢初侯國與邑直屬漢廷，不受所在漢郡、王國管轄；「蕭邑之印」的蕭邑既然不屬楚國，實用印便不可能隨葬於楚王墓。參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頁 9-29。第一點與現有資料矛盾：獅子山未出太僕之印，僅出太僕丞印，其丞之印自然是銅印；獅子山未出中尉之印，只有「楚中尉印」封泥；上文已指出庫房根本沒有銅印「內史之印」，只有封泥「楚內史印」。第二、三點，前文已辨

品」，僅次真跡一等。¹⁶⁰北洞山 13 方銅印裡楚御府印、楚邸、楚宮司丞、虹之左尉、山桑丞印、襄賁丞印等 6 方有使用痕跡，楚邸、楚宮司丞、襄賁丞印更是長期使用，其為實用印無可置疑。¹⁶¹獅子山楚王陵發掘者曾經探討約 200 方官印的使用情況：

這批銅印章均鑄造而成，絕大多數稜角完好，字劃整齊，無使用痕跡；少數印章碎為數塊，雖經黏接，稜角仍多磨損，字劃不整，顯經使用。¹⁶²

楚王隨葬的屬下官印為何會有使用痕跡呢？羅福頤指出「漢官制度，官吏遷、死，必歸印綬」；¹⁶³孫慰祖根據「同文不同範」的封泥，推測漢代前任官吏所歸官印，並不交由繼任官吏使用；¹⁶⁴近年范正紅細緻比對目前所見西漢前期齊國的 95 方「臨菑丞印」封泥，指出其由 29 方不同的「臨菑丞印」印章鈐印而成。臨淄丞應為縣丞，¹⁶⁵一般只有一人。¹⁶⁶西漢前期齊國國祚不過 76 年，卻至少更換了 29 個「臨菑丞印」。這 29 位臨淄丞不可能盡皆死亡，「臨菑丞印」的更換應為官吏遷轉，新舊任臨淄縣丞交接之故。¹⁶⁷綜上所述，漢代官吏交接時，

正。第四點上文亦指出庫房並無「蕭邑之印」封泥，只有「蕭□□□」封泥。

¹⁶⁰ 關於「明器」的概念，參巫鴻，〈明器的理論和實踐——戰國時期禮儀美術中的觀念化傾向〉，頁 193-208。耿建軍推測獅子山有使用痕跡的官印是楚廷回收的實用印，沒有使用痕跡的官印是備用印。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82。

¹⁶¹ 《北洞山報告》，頁 114-117。

¹⁶² 〈獅子山收穫〉，頁 14。

¹⁶³ 羅福頤，《古璽印概論》，頁 2。

¹⁶⁴ 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頁 82-84。

¹⁶⁵ 齊國首都為臨淄，臨淄郡應為齊內史所取代，故臨淄丞不是臨淄郡丞。

¹⁶⁶ 如分左、右丞，應使用「臨菑左丞」、「臨菑右丞」之印，不會使用「臨菑丞印」。

¹⁶⁷ 范正紅，〈西漢「臨淄丞印」封泥同文異印現象探討〉，頁 142-146。

前任官吏的舊印須上繳府庫，不得保留；但新任官吏並不使用舊印，而用新鑄官印，故政府須另行鑄刻新印，以供新官使用。由於官吏遷轉頻繁，各級中央、地方官署均須交接新印，政府平時必已先行鑄造備用官印，嚴密保管於府庫，以供交接。當楚王想要用文武百官的官印殉葬，以象徵楚國政府與疆域時，便可利用楚國府庫內的備用官印與舊官印。

相較於〈秩律〉與〈百官公卿表〉，獅子山官印目前所見的官吏種類遠為不足，盜墓賊可能取走了大量官印，原先隨葬的官印應更為完整。〈百官公卿表〉記載漢初諸侯王官制比擬漢廷，¹⁶⁸上文整理楚王陵隨葬中央官印，說明楚國中央官制確實模仿漢廷。漢廷規定秩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使用銀印，因此獅子山理應出土楚國二千石官吏的銀印。而漢初〈秩律〉簡 440-441 所載二千石官至少有郡守、郡尉等 17 種，¹⁶⁹其中多數官職楚國應該也有設置，故獅子山應出土郡守、郡尉的銀印。¹⁷⁰然而獅子山官印僅見楚都尉印與楚騎尉印等 5 方銀印，其餘二千石官吏的銀印一個未見，應是盜墓賊的「戰果」所致。楚王金印、大部分二千石銀印與部分銅印被盜墓賊取走，僅有 5 方銀印與部分銅印倖存。即使漢初楚國置有郡守、郡尉，楚王隨葬郡守、郡尉的銀印，仍極可能成為盜墓賊的囊中之物，不見乃在情理之中，因此郡守、郡尉的銀印關失不宜作為楚國無郡論的證據。

(三) 郡吏缺席——從銅印論漢初楚國無郡

既然封泥與銀印都不是漢初楚國無郡論的有力證據，本文可依賴

¹⁶⁸ 《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頁 741-743。

¹⁶⁹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258。

¹⁷⁰ 前述獅子山封泥有楚中尉印、楚內史印，是漢初楚國設有中尉、內史的鐵證。

的證據只剩銅印。獅子山現存超過 200 方銅印，既象徵地下政府與疆域，亦應呈現漢初楚國地上政府與疆域的基本面貌。獅子山銅印均為中央與縣級官印，亦獨闕郡級官印。若要以郡級銅印之闕證明漢初楚國無郡，須先考慮獅子山缺少哪些郡級官吏的銅印。漢代秩級不滿二千石的官吏，方佩帶銅印。根據游逸飛考證〈秩律〉所製漢初郡吏秩級表，¹⁷¹可列出秩級為千石至二百石的郡吏，製作漢初佩帶銅印郡吏表(表 15)。

表 15 漢初佩帶銅印郡吏表

秩級	官名
千石	司馬、騎司馬
八百石	發弩、司空、輕車
六百石	守丞、尉丞、候、騎千人(塞尉、城尉)、工官、水官
五百石	卒長、(塞尉、城尉)
四百石	司馬丞、騎司馬丞(塞尉、城尉)
三百石	發弩丞、司空丞、輕車丞(塞尉、城尉)
二百石	候丞、騎千人丞

表 15 包含千石的郡司馬、郡騎司馬，八百石的郡發弩、郡司空、郡輕車，六百石的郡守丞、郡尉丞、郡候、郡騎千人、郡工官、郡水官，五百石的郡卒長，四百石的郡司馬丞、郡騎司馬丞，三百石的郡發弩丞、郡司空丞、郡輕車丞，二百石的郡候丞、郡騎千人丞，以及秩級在六百石至三百石不等的郡塞尉、郡城尉，共 21 種郡吏，其銅印理應於獅子山出土。現存秦漢銅印與封泥，見有郡守丞等 33 種二千石以下郡吏的銅印與封泥，其中可能為秦及漢初時期的銅印與封泥至少有郡守丞等 20 種(參見文末附表)。上述數十種郡吏銅印與封泥，理應見於漢初獅子山，若無特殊理由，應不至毫無所見。

¹⁷¹ 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郡吏補考〉，頁 261-271。

考察獅子山楚王陵隨葬官吏銅印的類型，可進一步論證獅子山未見郡級銅印並非偶然。前文指出漢初楚國官制模仿漢廷，楚國中央官吏與漢廷中央官吏雷同，楚國郡吏則應與上述 30 餘種秦漢郡吏雷同。然而在秦漢郡級官印裡出現的丞、司馬、司空、輕車、候、騎千人等官吏，既常見於秦漢中央政府，又佔了獅子山楚王陵隨葬中央與縣級官吏銅印的半數以上(14 種、137 方，見表 16)。既然秦漢官吏銅印有中央與郡縣官吏的銅印，又有漢初楚國中央與縣吏的銅印，為何獨不見漢初楚國郡吏的銅印呢？

表 16 與郡吏同類的獅子山隨葬中央、縣級官吏銅印表

官職	丞	司馬	司空	輕車	候	騎千人
銅印	穀陽丞印	楚中司馬	楚中司空	楚輕車印	楚中候印	楚騎千人
	文陽丞印	楚營司馬	楚營司空		楚候之印	
	下邳丞印	楚司馬印				
	符離丞印					
	彭城丞印					
總數	5	33	8	1	81	9

綜上所述，如果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解釋獅子山楚王陵闕失郡級銅印的現象，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漢初楚國沒有置郡。既然漢初楚國無郡，當然便不存在郡級官吏，楚王便不會隨葬郡級官印、封泥。

(四)廢郡以外的可能性？

秦朝統一天下後，於其疆域普置 36 郡。即使漢初楚國甫立國時便已無郡，亦須廢除原有的秦郡。因此漢初楚國無郡的現象意味著漢初楚國曾經廢郡。然而漢初楚王陵闕失郡級銅印的現象，是否可找出廢郡以外的其他解釋呢？除非排除各種可能，否則漢初楚國廢郡充其量只是一種假說，而且還不一定是可能性最大的假說。因此本節嘗試

考慮其他解釋的可能性，並一一探討其論證弱點，企圖以排除法確立漢初楚國無郡論。

第一種可能性：現存秦漢官印、封泥裡，郡級官印、封泥的比例不高，漢初楚國不見郡級官印、封泥，或許只是偶然。¹⁷²根據《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現存秦官印約 96 種(扣除半通印)，郡吏官印約 10 種，比例為 10%；秦封泥約 652 種，郡吏官印約 90 種，比例為 14%。再據《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漢初官印共 25 方(扣除半通印)，郡吏官印 5 方，比例為 25%；西漢官印共 322 方(扣除半通印及道家印)，郡吏官印 26 方，比例為 8%；新莽官印共 167 方，郡吏官印 15 方，比例為 9%。又據《古封泥集成》，秦漢魏晉封泥共 1,821 方，郡吏官印約 274 方，比例為 15%。¹⁷³即便以上述比例最低的 8%為準，獅子山楚王陵隨葬 253 方官印、封泥，至少應有 20 方郡吏官印、封泥，結果卻一方都不存在；土山漢墓出土約 4,500 方封泥，至少應有 360 方郡吏封泥，結果仍是一方都不存在。現存漢初楚國官印、封泥的絕對數量已足以排除統計上的偶然性，倚賴默證的「漢初楚國無郡論」並非偶然性的解釋可以取代。

第二，如果漢初楚國曾擴大王國內史的轄區，縮小東海、薛郡的面積，楚王陵隨葬官印便可能只包含中央官吏及內史轄縣，並不包含位於東海、薛郡之地的屬縣官印、封泥，目前根據漢朝輿圖版籍所推定楚國諸縣的屬郡及內史，並不符合漢初楚國的實際隸屬關係。¹⁷⁴然而本文全面整理楚王陵地方官印、封泥，製作表 17、圖 6。

楚王陵隨葬地方官印可考者有 22 處：楚內史 11 地，薛郡 3 地，

¹⁷² 邢義田於 2013 年 1 月 23 日游逸飛的博士論文大綱口試時提出。

¹⁷³ 見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

¹⁷⁴ 此說來自 2010 年 11 月 5 日黃怡君的私人信件。

東海郡 8 地，分布廣泛。原處於東海與薛郡者共 11 地，其中有濱海的朐、海邑，位處齊、梁邊境的彭、卞、文陽，如果這些縣級政區均轄於內史，東海與薛郡根本無處可置，只能廢除。楚王陵隨葬官印已反映整個楚國的疆域，其外不可能別有東海、薛郡。況且楚王隨葬官印是為了象徵自己的統治權，除非東海與薛郡已被漢廷收奪，否則其郡吏印章不應排除於楚王陵隨葬官印之外。

表 17 楚王陵隨葬地方官印、封泥原先屬郡(擬)

郡名	縣道邑名
彭城(楚內史)	武原、穀陽、相、僮、蕭、符離、彭城、呂、虹、山桑、北平
薛	卞、文陽、承
東海	凌、彭、襄賁、緡、蘭陵、朐、下邳、海邑

第三，有學者認為郡在戰國時期的功能偏於軍事，帶有臨時性質，並非普設的一級政區。因此郡的軍事獨立地位可能導致楚王不隨葬郡級官印，就像漢初皇帝可能不隨葬諸侯王、列侯之印。¹⁷⁵但游逸飛曾據里耶秦簡與張家山漢簡指出，秦至漢初的郡是普置於疆域之內的一級政區，具有司法、財政、人事等各種職權，是不可或缺的地方行政層級。¹⁷⁶探討漢初諸侯王國郡制時，應充分重視秦至漢初的郡制背景，不宜用更早的戰國郡制解釋漢初楚王陵不隨葬郡吏官印的原因。何況郡的獨立地位再高，楚國的郡守、郡尉終須由楚王任命，楚王隨葬郡吏官印以象徵自己對郡的支配權，再自然不過。而楚漢之際，酈食其(?-204 B.C.)與張良(?-185 B.C.)爭論是否立六國之後時，劉邦(?-195 B.C.)「趣刻印」、「趣銷印」，其後又「使良授齊王信印」；¹⁷⁷之後劉邦即皇

¹⁷⁵ 此說為「第六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2012 年 8 月 25 日)評論人阿部幸信於會中評論提出。

¹⁷⁶ 參游逸飛，〈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頁 73-215。

¹⁷⁷ 《史記》，卷 55，〈留侯世家〉，頁 2040-2042。

帝位、大封異姓王侯，諸侯王、列侯之印亦由漢皇帝授予，漢皇帝不無可能隨葬諸侯王、列侯之印，象徵自己冊封王侯的權力。漢朝皇帝與諸侯王隨葬屬郡官吏的印章，更在情理之中。以漢初皇帝不隨葬諸侯王、列侯之印，進而懷疑漢初楚王不隨葬郡級官印，實無任何根據。

第四，漢初諸侯王國丞相由漢廷直接任命，不由諸侯王任命。如果楚國的郡守、郡尉亦由漢廷任命，不由楚王任命，楚王便可能不隨葬郡級官印。¹⁷⁸然而《史記·五宗世家》裡司馬遷指出七國亂後，漢廷方掌握諸侯王國的二千石官吏任免權。¹⁷⁹獅子山至少隨葬都尉、騎尉等 5 方銀印，反映第二代楚王至少擁有部分二千石官吏的任免權。目前並無其他證據支持漢廷於七國亂前，便可任免楚國的郡守、郡尉。漢廷若取得楚國郡守、郡尉的任免權，便意味楚王喪失了東海、薛郡的控制權。而第三代楚王劉戊參與七國之亂的導火線為東海、薛郡被漢廷削奪，恰恰反映漢廷無權任免東海、薛郡的守、尉，東海、薛郡此前由楚國牢牢掌控。

第五，如果楚國並未廢郡，只是虛郡、凍郡，由內史代行郡責，楚王便可能不隨葬郡級官印。¹⁸⁰此說固有可能，卻與廢郡、無郡僅去

¹⁷⁸ 此說為徐少華在「珞珈中古史青年學術沙龍」(2012 年 9 月 19 日)時賜教，後來徐沖私下討論時亦指出。

¹⁷⁹ 《史記》，卷 59，〈五宗世家〉，頁 2104。另，《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記載高祖時「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似反映「自置二千石」是齊國特權；《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記載文帝時薄昭(?-170 B.C.)對淮南王言：「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似反映文帝時諸侯王國已不能自置二千石。但這兩條文獻均與七國之亂前諸侯王國控制數郡的獨立性相悖，〈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的記載又與楚王陵隨葬銀印，應可自置二千石的現象相悖，均不如《史記》來得可信。見《史記》，卷 52，〈齊悼惠王世家〉，頁 2004；《漢書》，卷 44，〈淮南衡山濟北王傳〉，頁 2137。

¹⁸⁰ 此說為林楓珏在 2010 年邢義田所授「秦漢簡帛金石研究」課程的課堂討

一線。且傳世文獻反映有郡、出土文獻反映無郡，虛郡、凍郡介於有郡與無郡之間，表面上能調和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歧異，但深究起來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皆不能證明虛郡、凍郡，此說目前只是調和、彌縫之論，實須出現其他證據後方能成立。

綜上所述，面對漢初楚國官印、封泥闕失郡級的奇特現象，「漢初楚國無郡論」應是目前最為合理的解釋。

四、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矛盾的原因

前文根據出土文獻論證了漢初楚國無郡的現象，然而傳世文獻記載楚國有郡的現象仍不容忽視。下文企圖從歷史書寫與時間標尺的角度探索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矛盾的原因。

(一)漢廷的歷史書寫

漢初楚國出土官印與封泥，是研究楚國的第一手史料，並非史家所書寫的二手文獻，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反映漢初楚國歷史的原始面貌。相較之下，傳世文獻記載漢初楚國有郡，不無可能是後世史家有意無意的歷史書寫所造成，不一定就是漢初楚國的歷史真相。

探討傳世文獻記載漢初楚國有郡的歷史書寫前，須先參照漢初朝廷封建其他諸侯王國的歷史書寫，如《漢書·高帝紀》記載：「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¹⁸¹漢初韓國僅一郡之地，建國後應置有內史，因此韓王信(?-196 B.C.)極可能廢除漢太原郡，改置內史。即便韓國仍置郡，其郡制也不應是下轄 31 縣的太原郡一郡。

論時提出，本文匿名審查人亦有類似意見。

¹⁸¹ 《漢書》，卷 1 下，〈高帝紀〉，頁 61。

可見其記載只反映了漢廷將太原郡轄下 31 縣之地封給韓國，並未反映韓國建國之後的郡縣建置。後世史家根據這類記載復原漢代諸侯王國內部的政區建置，其實都帶有一定程度的推測成分。¹⁸²同理，《漢書·楚元王傳》記載漢初楚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¹⁸³也不一定反映楚國建國後的郡縣建置，嚴格來說只是反映漢廷將轄下 3 郡 36 縣之地封給楚國。楚國之後如何調整內部政區設置，並非此條歷史書寫所關心。《史記》、《漢書》等正史類傳世文獻終究是從漢廷的立場出發，也就是從「他者」的視野去記述諸侯王國的史事，這類歷史書寫呈現諸侯王國歷史真實的效力，有時不如諸侯王國自身的出土文獻，勢所必然。

(二)時間標尺——漢初楚國置郡、廢郡的歷程推測

如果說探討漢初楚國有郡的歷史書寫，擴大了解讀史料的想像空間，弱化了「史實」的可信度。那麼探討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時間標尺，則會縮小史料的解釋範圍，強化所見現象的說服力。即便撇除歷史書寫的影響不談，在更嚴格的時間標尺下觀察，傳世文獻記載高祖六年第一代楚王受封三郡之地、景帝二年第三代楚王被削奪二郡之地，充其量只能證實這 50 年間楚國有郡，至於史家主張此期間楚國始終有郡，嚴格來說只是一種推測。上述對傳世文獻的分析雖合乎邏輯，但若不以同樣嚴格的時間標尺檢驗漢初楚國官印、封泥的解釋範

¹⁸² 漢初高祖封建彭越之梁國、文帝封建其子揖之梁國均僅轄碭郡之地，文帝封建其子武之淮陽國僅轄淮陽郡之地。這些諸侯王國境內大抵僅置內史，即便有郡，亦與漢郡建置不同。見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頁 54-63、41-45。

¹⁸³ 《漢書》，卷 36，〈楚元王傳〉，頁 1922。

圍，漢初楚國無郡論便也只是一種推測，不具說服力。下文便以年為單位，分析漢初楚國官印、封泥可以復原漢初楚國哪些年的歷史。

1. 無郡的絕對年代(179-175 B.C.)

前文已指出北洞山、獅子山隨葬官印反映的疆域，是第一代、第二代楚王卒年(179、175 B.C.)的疆域。由於第二代楚王在位僅 4 年，期間楚國政區復郡、又廢郡的可能性極低，因此從第一代楚王卒年至第二代楚王卒年，楚國應當無郡。這段期間是漢初楚國無郡的絕對年代。

2. 無郡的上限——呂后元年 / 六年(187 或 182 B.C.)

上述絕對年代前後，楚國仍可能無郡。第一代楚王劉交幾不可能於死前才廢郡，故楚王廢郡之令的頒布時間至少可上溯至劉交統治後期。在劉交統治後期時，距離無郡的絕對年代(179 B.C.)不到十年的呂后元年 / 六年時，漢廷分割薛郡之地以封建魯國，楚國僅存楚內史與東海郡之地。¹⁸⁴漢廷以外力撕裂楚國北部疆域，楚國內部可能有相應的政區調整，薛郡的喪失可能是楚國廢除東海郡的契機。¹⁸⁵過去東海郡僅為整個楚國疆域的三分之一，此年卻因為楚國喪失了薛郡，而使東海郡守管轄楚國近半疆域，與楚內史幾成東西分治之勢。東海郡又位於楚國疆域的後方，無法成為楚國與漢郡之間的緩衝。楚王既不須

¹⁸⁴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頁 27；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1-61。

¹⁸⁵ 辛德勇研究秦郡置廢問題指出，秦始皇三十三年(214 B.C.)平定嶺南、東越，設置新郡；為了保持郡制的整體性，並滿足各種目的，同時對舊郡疆界加以調整、甚至置廢。換言之，一郡之置廢，可能連帶影響他郡之存廢。研究郡制須有整體眼光。參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頁 3-92。

設郡於大後方，更難以容忍與郡守「分陝而治」，¹⁸⁶廢除東海郡幾可說是必然的決策，東海郡很可能於此時廢除。

廢郡之令是否可能更早頒布？若追溯至漢初楚國始建之時，《史記·高祖本紀》記載：「齊王韓信(?-196 B.C.)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¹⁸⁷劉邦似允許韓信以楚地風俗治楚。學者據包山楚簡指出戰國楚國之郡多位於邊境，郡長官由縣公兼任。¹⁸⁸楚地風俗與秦漢郡制有所扞格，兼以高祖時期其他異姓諸侯國，如英布(?-195 B.C.)的淮南國、吳芮(?-202 B.C.)的長沙國，均採行某些戰國晚期的楚國官制，¹⁸⁹故韓信不無可能廢除秦漢郡制，改行帶有楚地特色的郡縣制。然而此說即便成立，韓信之楚國亦應在邊境置郡。且韓信王楚不過兩年便被貶為淮陰侯，楚王劉交取而代之後，既可能因循楚地舊制，安撫民心；抑可能改行漢郡之制，宣示劉氏統治的正當性。現有史料不足以論證漢初楚國是否建國之初便已無郡，一切只能靜候考古學家的手鏟。

3. 無郡的下限——第三代楚王統治時期

薛郡於第二代楚王即位時便已歸還楚國，楚國疆域恢復成建國之初的三郡之地，但據獅子山隨葬官印、封泥，第二代楚王並未恢復東

¹⁸⁶ 趙立新，《西晉末年至東晉時期「分陝」政治——分權化現象下的朝廷與州鎮》。

¹⁸⁷ 《史記》，卷 8，〈高祖本紀〉，頁 380。

¹⁸⁸ 陳偉，〈包山簡所見楚國的宛郡〉，頁 1-7；游逸飛，〈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頁 43-71。

¹⁸⁹ 《史記·樊鄴滕灌列傳》記載高祖十一年(196 B.C.)淮南國有「上柱國」與「大司馬」，《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記載高祖九年(198 B.C.)長沙國有「柱國」。「柱國」與「大司馬」均為戰國楚官。見《史記》，卷 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頁 950；卷 95，〈樊鄴滕灌列傳〉，頁 2672。

海、薛郡的建制。為何楚王無意復郡呢？上層政治者的心意難測，本文只能嘗試提出幾種推測。

首先從集權與分權的角度考量，第一代楚王當初似因楚內史與東海郡的東西分治而廢郡，第二代楚王若恢復東海、薛郡，其疆域仍為二郡一內史的政區劃分，直若三分天下。雖然郡守由楚王任命，東海與薛郡郡守未必會聯合起來反對楚王。但漢初郡守當時終如一方諸侯，權力強大而獨立，楚王應當無意恢復兩個可能尾大不掉的潛在威脅。

再從地方行政層級的角度考量，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秦縣數目近千，¹⁹⁰故須置 36 郡，協助中央政府治理地方。漢初近半國土由諸侯王國統治，但《漢書·地理志》記載：「漢興，以其郡(大)[太]大，稍復開置。」¹⁹¹僅轄 10 餘郡的漢廷仍覺得秦郡過大，將之析分，僅轄有數郡的諸侯王國豈能不作如是觀？而漢初楚國疆域所轄僅 36 縣，與秦之郡數相當，楚縣本身已足任一級政區，縣上設郡，實有疊床架屋之嫌。楚國廢郡實可建立更合理的地方行政層級制。郡既已廢，何須復之？

最後從政制延續性的角度考量，第一代楚王廢郡後，無郡已成為楚國「故事」。¹⁹²第二代楚王在位僅 4 年，不太可能改變乃父的政策，推動復郡。何況戰國晚期楚之郡縣制本與秦漢不同。從秦至漢初，「郡制」在楚國當地推行的時間不到 40 年，不復郡並非違逆傳統之舉，

¹⁹⁰ 嚴耕望認為，「秦縣總數當在九百以上至一千有餘，約言之當在一千縣左右」。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頁 35。民國初年史念海具體考出秦縣縣名 300 餘個，近年后曉榮根據出土資料，將復原的秦縣名稱數目推進至 756 個。史念海，〈秦縣考〉，頁 271-318；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頁 441-455。

¹⁹¹ 《漢書》，卷 28 下，〈地理志〉，頁 1639。

¹⁹² 邢義田，〈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頁 380-449。

廢郡反而具有恢復楚國傳統、恢復「周制」的意義。

上述三種理由同樣適用於第三代楚王劉戊，故其統治時期仍可能無郡。唯劉戊行事「淫暴」，¹⁹³最終參與七國之亂，反叛漢廷。劉戊復郡以強化楚國軍力，準備對抗漢廷，其可能性不能排除。如果劉戊復郡，漢廷於景帝二年削奪楚國的東海、薛郡，便可能符合楚國當時內部政區規劃。¹⁹⁴如果劉戊並未復郡，削郡的文獻便反映漢廷削奪東海、薛郡之地，只是按照中央既有的天下輿地圖行事，不顧楚國內部的政區變動，與本節開頭探討漢廷封建諸侯王國的歷史書寫的特徵完全一致，不禁令人想到〈秩律〉只記載漢廷中央官吏及直轄地方官吏，不記載諸侯王國官吏及王國屬縣。¹⁹⁵現存絕大多數的漢代傳世及出土文獻皆本於漢廷立場，導致其歷史書寫反映了以漢廷為本位的歷史事實。¹⁹⁶漢初諸侯王國的出土文獻雖少，卻有助於我們反思佔漢初天下近三分之二的諸侯王國的真實面貌，重新檢討漢廷本位的諸種「史實」。

4. 反例？——「楚東海守」封泥的斷代

上文已比較全面地論證漢初楚國無郡的現象，並檢討傳世典籍裡漢初楚國有郡的矛盾。然而反映漢初楚國有郡的不只傳世典籍，尚有其他材料反映漢初楚國有郡。

陳直曾收藏一方「楚東海守」(圖 7-15)封泥，傳出土於漢長安城遺址，現藏於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根據印文及出土地，該封泥應為漢

¹⁹³ 《漢書》，卷 36，〈楚元王傳〉，頁 1924。

¹⁹⁴ 即使劉戊復郡，亦可能擁有自己的郡制規劃，並未完全復原漢廷的東海、薛郡建置。

¹⁹⁵ 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頁 353-361。

¹⁹⁶ 徐復觀，〈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頁 163-202。

初某年楚國東海太守所鈐印，傳遞文書或物品至漢廷首都長安，為漢廷官吏拆封時遺留。¹⁹⁷

¹⁹⁷ 賈麥明，〈介紹幾枚漢代封泥〉，頁 93-94。賈麥明認為「東海」是縣名，有誤。根據 2014 年 6 月 9 日劉瑞先生至博物館拍攝的封泥正背面照片（圖 7-16、7-17），該封泥應屬真品。辛德勇近年指出不少陳直收藏品為偽，參考時須審慎判斷。本文初稿亦懷疑「楚東海守」封泥的可信度，若未得見封泥正背面照片，對其史料價值便不無保留。參辛德勇，《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上篇，〈重談中國古代以年號紀年的啟用時間〉、下篇，〈所謂「天鳳三年鄆郡都尉」碑銘文與秦「故鄆郡」的名稱以及莽漢之際的年號問題〉，頁 1-101、241-394。此外，該封泥的文例亦值得探討。漢初楚國官印、封泥，開頭若為國名(楚)，其後必接官名，無一例為地名；帶有地名的縣、鄉官印、封泥，則從不加國名(楚)。傳出土臨淄劉家寨的漢初齊國封泥，亦符合上述兩種規律，反映國名與地名的互斥關係。參劉創新編，《臨淄新出漢封泥集》；張龍海、張愛雲，〈山東淄博市臨淄區齊國故城出土漢代封泥〉，頁 91-92；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臨淄齊故城》，頁 521-526；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頁 119-188。「楚東海守」封泥開頭既為國名，其後又接地名，不符合上述兩種規律，文例極其特別。類似之例又見陳介祺收藏的「廬江豫守」封泥，印文應理解為「廬江國豫章郡守」，是文帝十六年(164 B.C.)至景帝四年(153 B.C.)之間，廬江國轄有豫章郡時的遺物。參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頁 48。該封泥與「楚東海守」封泥的文例一致，反映諸侯王國國名與郡名確實可以並存。該封泥後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刊布了封泥正背面照片。觀察其印文風格及泥背痕跡，應屬真品。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編，《中国の封泥》，頁 47。綜上所述，漢初齊、楚等諸侯王國官印、封泥文例大抵存在國名與地名互斥的規律，但郡名卻不受此規律的約束，其間矛盾該如何解釋？將「楚東海守」與「廬江豫守」封泥視為特例，是注重「東海」與「豫」的地名性質，認為地名不應與國名相接。然而「廬江豫守」封泥為了符合四字印的習慣，將郡名「豫章」省略為「豫」，卻不將國名「廬江」省略為「廬」，反映這類封泥印文的王國國名不可省，但郡名可省，國名比地名更為重要。因此，這類封泥首先應歸類於國名印，不應歸類於只帶有地名的縣、鄉印。換言之，「楚東海守」、「廬江豫守」等王國郡守二千石官印，其性質更近於「楚中尉印」、「齊內史印」等王國中央二千石官印，「東海」與「豫」雖是地名，其性質卻與縣、鄉官印的地名有一定區別，

該封泥揭示楚國曾轄東海郡，是否為漢初楚國無郡論的有力反證呢？根據前文對時間標尺的嚴格析分，這一方無法明確判定製作年代的封泥，並不能推翻漢初楚國於某些時期無郡的可能性。就漢初楚國廢郡、置郡的歷程判斷，該封泥的鈐印時代較可能為第一代楚王統治早期(206-187 / 181 B.C.)，亦可能為第三代楚王統治時期(174-154 B.C.)，不可能為第一代楚王卒年至第二代楚王卒年期間(179-175 B.C.)。現有資料仍舊支持漢初楚國無郡論的建立。

五、無郡是特例抑或通則？

漢初楚國無郡的現象，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諸侯王國與郡之間的關係。上文除了指出漢初諸侯王應有自行置廢政區的權力外，又從政區變動、中央集權、地方行政層級與政治制度的延續性諸層面探索漢初楚國廢郡的原因。然而上述原因皆非楚國所獨有，那麼漢初其他諸侯王國是否亦曾廢郡呢？雖然這個問題必須由更多的個案研究來回答，已非本文篇幅所能展開，但為了顧及本文論述的完整性，本節仍欲對此問題稍加梳理。

(一)齊國、淮南國無郡

傳世文獻裡漢初齊國曾經封郡、獻郡、割郡，齊國有郡似無可疑。¹⁹⁸然而出土文獻反映漢初楚國無郡既為前車之鑑，據傳世文獻論

郡守的中央官吏性質遠較縣令長、鄉嗇夫為強，符合我探討的早期郡制的中央外派官署性質。參游逸飛，〈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頁 159-215。

¹⁹⁸ 《漢書·高帝紀》載高祖「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載「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漢書·高五王傳》載呂后元年「割齊之濟南郡為

證漢初齊國有郡便須更加謹慎。何況前文已指出漢廷對諸侯王國封郡、割郡的歷史書寫，不一定能真正反映諸侯王國當時的政區建置。¹⁹⁹研究漢初齊國的政區建置，應充分重視當地的出土文獻。傳出土於臨淄劉家寨、約 1,800 方的漢初齊國封泥，裏頭同樣沒有任何一方可確定為郡吏所用的封泥，似乎反映漢初轄有七郡之地的齊國亦曾廢郡。²⁰⁰

傳世文獻多記載漢初諸侯王國有郡，但有了諸侯王國曾經廢郡的視野，重新閱讀傳世文獻，不無可能重新詮釋。如《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收錄文帝初年的〈薄昭與淮南厲王書〉：

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古)[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²⁰¹

薄昭勸諫淮南王不要任意招納亡人，歷數相關官吏之責任，以及於王身。文中「吏主者」、「論相以下」均為泛指，應包含郡守、郡尉等郡長官。然而，薄昭具體列舉御史大夫、中尉、衛尉、大行、內史、縣令等相關官吏時，卻未列舉郡守、郡尉，令人不解。文帝初年淮南

呂王奉邑……呂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見《漢書》，卷 1 下，〈高帝紀〉，頁 61；卷 38，〈高五王傳〉，頁 1991；《史記》，卷 52，〈齊悼惠王世家〉，頁 1999。

199 《史記·孝文本紀》記載「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見《史記》，卷 10，〈孝文本紀〉，頁 423。周振鶴認為劉章之城陽國封域為城陽郡，馬孟龍認為尚包含琅邪郡。不管城陽國封域是一郡之地或兩郡之地，《史記》以「劇郡」一詞稱城陽國的封域，亦是漢廷文獻對諸侯王國籠統書寫之例。參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頁 108；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頁 162。

200 游逸飛，〈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頁 265-293。

201 《漢書》，卷 44，〈淮南衡山濟北王傳〉，頁 2139。

國轄有四郡之地，扣除應改為內史的九江郡，尚有衡山郡、廬江郡、豫章郡三郡。「內史、縣令主」負責歸義蠻夷與亡人自出者，內史與縣令明顯有隸屬關係，應即內史轄縣的王畿體制。然而《二年律令》裡除了內史轄縣的「中」(王畿)，亦見與「中」相對的郡二千石(郡守、郡尉)轄縣體制。²⁰²此處既言內史、縣令，不應不提與之並立，亦應負責郡內歸義蠻夷與亡人自出的郡守。因此文帝初年轄有四郡之地的淮南國亦可能無郡，由內史直接控制九江、衡山、廬江、豫章四郡的屬縣。此說雖為大膽的孤證，但揆諸上文漢初齊、楚兩國出土文獻幾未見郡的現象，精細詮釋史料價值相對原始的漢初諸侯王國書信，未必為無用之功。

(二)長沙國、代國有郡

文獻裡亦有某些諸侯王國有郡的記載不容置疑。並非所有出土文獻皆反映諸侯王國無郡，湖南沅陵虎溪山漢簡裡有文帝時沅陵侯國的黃簿，有一枚簡記載：

故沅陵在長沙武陵郡□²⁰³

該簡記載沅陵侯國的位置，「長沙武陵郡」不宜斷開理解為長沙郡與武陵郡，只能理解為長沙國的武陵郡，指沅陵侯國位於長沙國的武陵郡，長沙國的地方行政結構應為郡縣二級制。²⁰⁴武陵郡位處長沙國西部，與南越、西南夷接壤，有抵禦外患的軍事功能。周振鶴更指出長沙國受封後，將長沙內史(原長沙郡)的南部分出置桂陽郡，以抵禦南越

²⁰² 游逸飛，〈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頁 159-215。

²⁰³ 該簡見於曹學群，〈吳氏長沙國歷史地理四題〉，頁 420-426。

²⁰⁴ 長沙國首都在長沙，長沙郡應改為內史，「長沙武陵郡」即使單獨出現，也不太可能理解為長沙、武陵二郡。

的威脅，是謂長沙的「南邊郡」。²⁰⁵漢初長沙國顯然曾經有郡。

上文雖強調傳世文獻經常本著漢廷立場，有關諸侯王國置郡的記載不一定準確。但記載相對精確的傳世文獻也存在，如《史記·韓信盧綰列傳》記載高祖十年時，「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²⁰⁶趙國丞相周昌為常山郡守、郡尉的長官，故奏請劉邦將之斬首。險些被斬首的常山郡守、郡尉不是向壁虛造，因此陳豨叛變時，趙國顯然置有常山郡。《漢書·周勃傳》記載高祖十一年周勃討伐代國叛亂時，「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囡。因轉攻得雲中守遯、丞相箕肆、將軍博。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²⁰⁷陳豨屬下既有雁門郡守與雲中郡守，叛亂發生時，代國便應置有雁門、雲中兩郡。雁門郡守與雲中郡守亦非向壁虛造。

綜上所述，漢初諸侯王國之郡或有或無。若以嚴格的時間標尺檢視齊、淮南、長沙、趙、代五國，便只能說趙、代兩國於高祖時有郡，長沙國於文帝時有郡，淮南國於文帝初年無郡。總之，楚國無郡並非孤立的個案，但諸侯王國廢郡與否似乎也沒有明顯的規律存在。²⁰⁸

²⁰⁵ 《史記》，卷 17，〈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頁 803；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頁 121。

²⁰⁶ 《史記》，卷 93，〈韓信盧綰列傳〉，頁 2640。

²⁰⁷ 《漢書》，卷 40，〈周勃傳〉，頁 2053。此資料得鄭宗賢提示。此外〈樊噲傳〉記載樊噲(?-189 B.C.)擊破陳豨叛軍時，「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似指鹵獲代郡郡守孫奮。代國僅轄代、雁門、雲中三郡，代郡應改置內史，不應有郡守。此處代郡郡守或為戰時特制，或「守」未必指代郡郡守。見《漢書》，卷 41，〈樊噲傳〉，頁 2072。

²⁰⁸ 筆者游目於漢初天下與地圖，不禁令人感到興味：無郡現象較明確的齊、楚兩國，均未與匈奴、南越等外夷接壤；明確有郡的長沙、代國則分別與南越、匈奴接壤。有郡、無郡似與鄰邊與否關係密切。令人懷疑鄰邊的長

六、結語——無郡論的歷史意義

學界過去認為秦與漢初郡縣制的主要區別在於，漢朝建立郡國雙軌制，在郡之上增加了「王國」這一級政區，但郡、縣仍普置於「王土」。²⁰⁹本文指出楚、齊、淮南等諸侯王國於漢初某些時候無郡，漢家天下或有郡、或無郡，秦始皇「海內為郡縣」的景象並未完全見於漢初，²¹⁰只有縣乃普天之下共有。秦郡的普及，來自於秦的侵略戰爭及秦始皇廢除封建，面對廣土眾民的天下，不得不依賴郡制治理地方。漢初諸侯王國的疆域較小，無郡亦可有效治理地方，遂於適當時機廢郡。

相較於封建制，先秦時期置郡設縣一般服膺於中央集權。然而郡制的中央集權功能可能隨時移境遷而減弱、消失，甚至不利於中央集權。當漢初諸侯王國感到郡制無益於王國自身的中央集權時，廢郡之舉也就提上日程。雖然漢初諸侯王國廢郡、無郡只是局部、特殊的現象，在鋪天蓋地的郡縣化浪潮下，廢郡、無郡有如曇花一現、埋沒於

沙、代國保留郡制是為了抵禦外夷入侵，位處內地的齊、楚則因軍事需求較小而廢郡。根據漢朝「邊郡」與「內郡」的分類，似可將漢初諸侯王國粗分為「邊國」與「內國」。邊國與內國的外部差異為鄰邊與否，內部差異則為郡之有無。邊國有郡，內國無郡。此說並不完全吻合於目前所見資料，如趙國為內國，但有郡；淮南國為邊國，卻無郡。惟上文已強調，在嚴格的時間標尺檢驗下，漢初諸侯王國有郡、無郡的情況實處於變動之中。漢初某一時期不無可能形成趙國為無郡內國，淮南國為有郡邊國的政區格局。事實上，趙國雖為內國，但高祖時期大而近邊，在齊、楚之北，又與代國關係密切，甚至曾轄代國，以代為邊，似為特例。淮南國無郡的材料乃單一的默證，不易排除有郡的可能。因此趙國與淮南國不無可能皆為內國，皆有郡。本文不避淺陋，提出數種矛盾但皆有可能的情況，就教學界，以祈方家指正。

²⁰⁹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頁 37。

²¹⁰ 《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頁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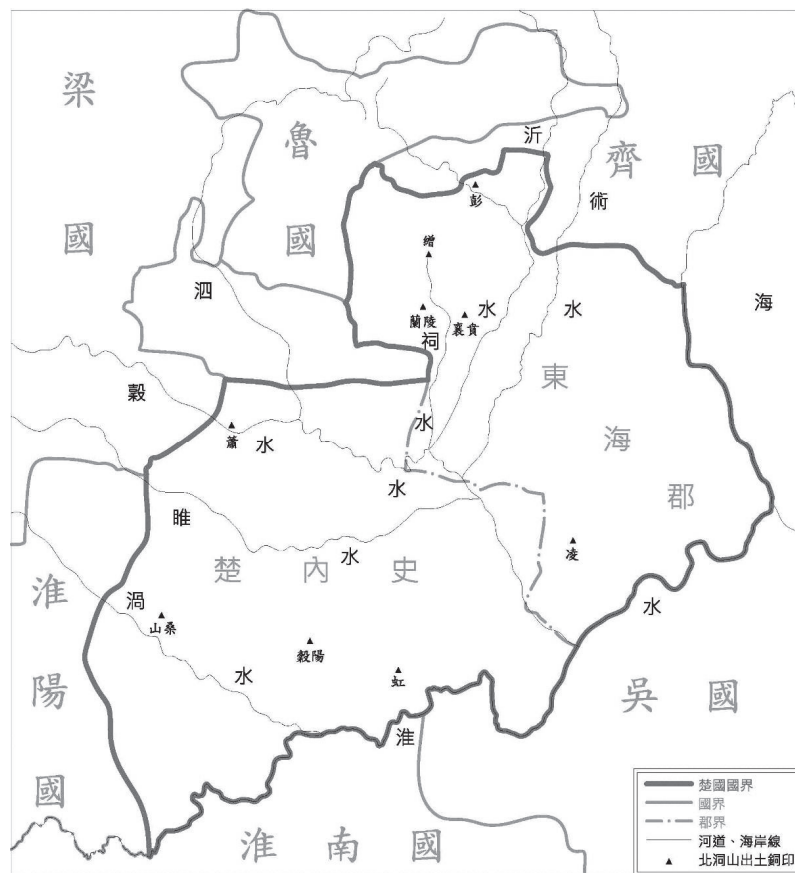
海內為郡的歷史洪流。《史記》、《漢書》對廢郡、無郡隻語未提，因為司馬遷、班固著意呈現郡縣化中央集權的歷史大勢，廢郡、無郡只是當時的小逆流，不必在通史、王朝史裡佔據篇幅。但當郡縣化中央集權的歷史主流已幾成教條時，揭示廢郡、無郡的現象，探索當時的逆流、伏流，²¹¹可能有助於我們反思郡縣制的本質並非中央集權的工具，郡縣制的發展亦可能走向地方分權。漢初楚國無郡論，所論雖小，卻可能帶給我們新的視野，重新理解秦漢地方政制的性質。

(本文於 2015 年 3 月 16 日收稿；2015 年 7 月 26 日通過刊登)

*本文寫作期間得到無數師友協助，如陳昭容、李銀德、劉瑞、呂健惠賜關鍵資料，吳文樺協助繪製地圖，初稿於邢義田開授的「秦漢簡帛金石研究」課程(2010.12)、「中國古代史討論會」(2011.4)、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第六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2012.8)、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的「珞珈中古史青年學術沙龍」(2012.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學門獎助研究生演講」(2013.1)、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清華古代史沙龍」(2013.6)宣讀，此外又得到李曉杰、辛德勇、藤田勝久、施謝捷、李開元、周振鶴、陳蘇鎮、宋少華、呂怡燕助教，黃怡君、鄭宗賢、鄭威、郭永秉、程少軒、渡邊將智、吳修安、何慕、劉曉芸、土口史記、梁萬斌、林宛儒、傅揚指正。唯一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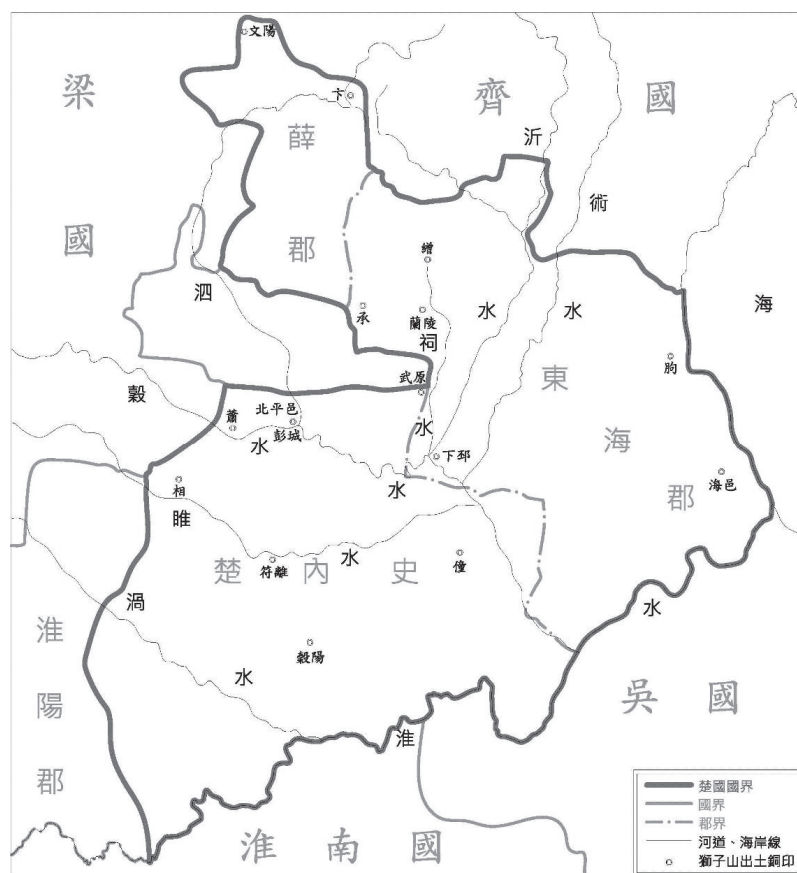
211 參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圖 1 北洞山隨葬官印反映的文帝元年、第一代楚王卒年楚國政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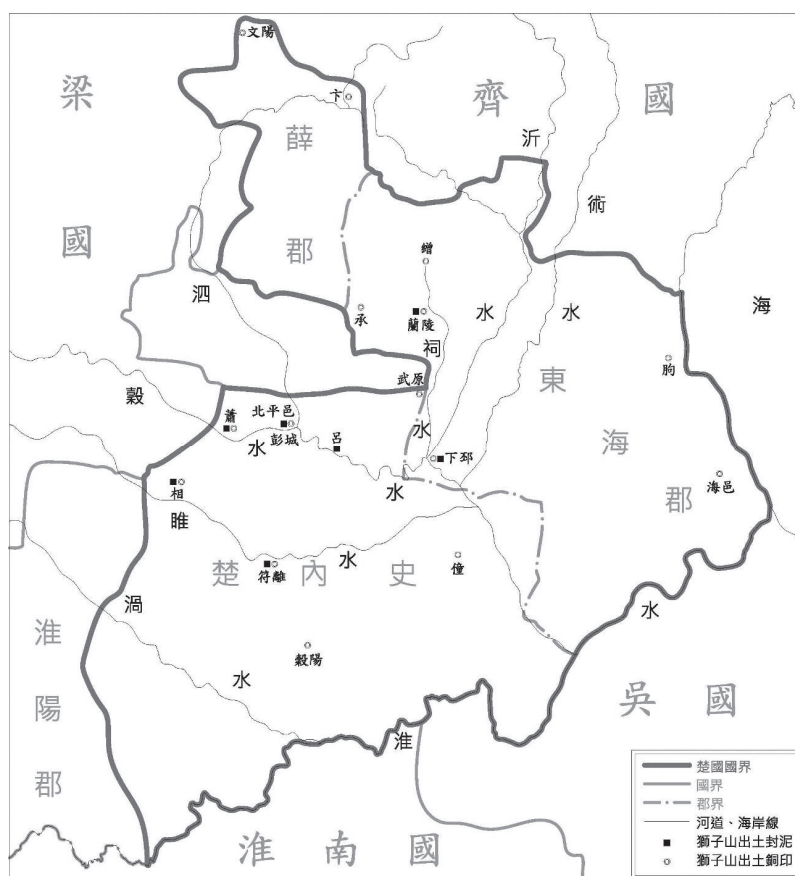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據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61，「呂后二年楚國政區圖」改繪。

圖 2 獅子山隨葬官印反映文帝五年、第二代楚王卒年楚國政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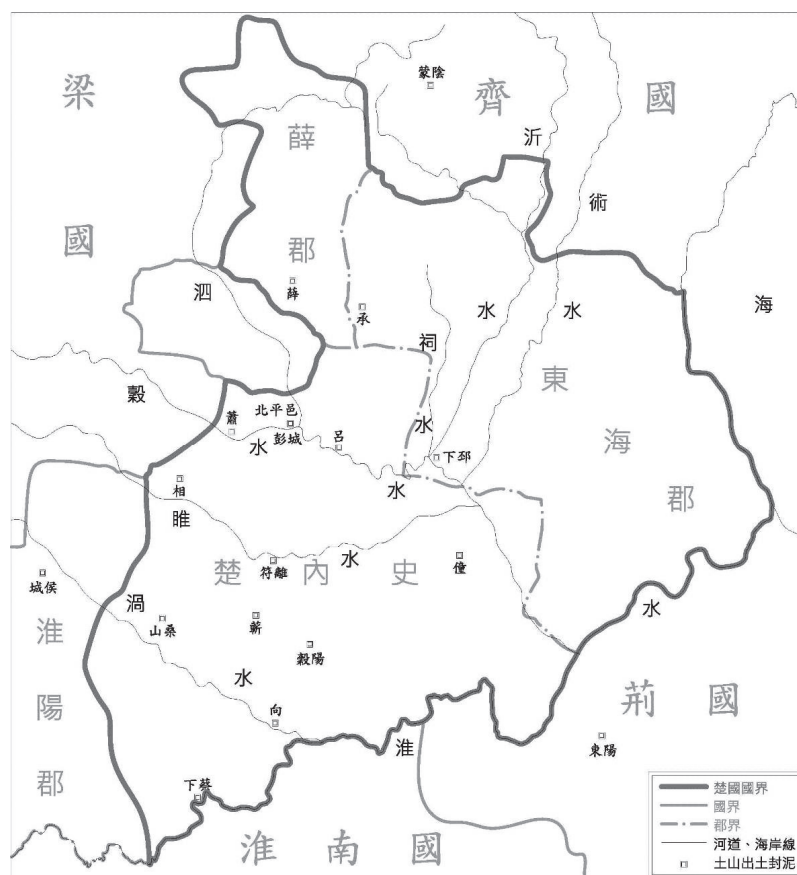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據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62，「文帝十二年——景帝元年楚國政界圖」改繪。

圖 3 獅子山隨葬官印、封泥反映文帝五年、第二代楚王卒年楚國政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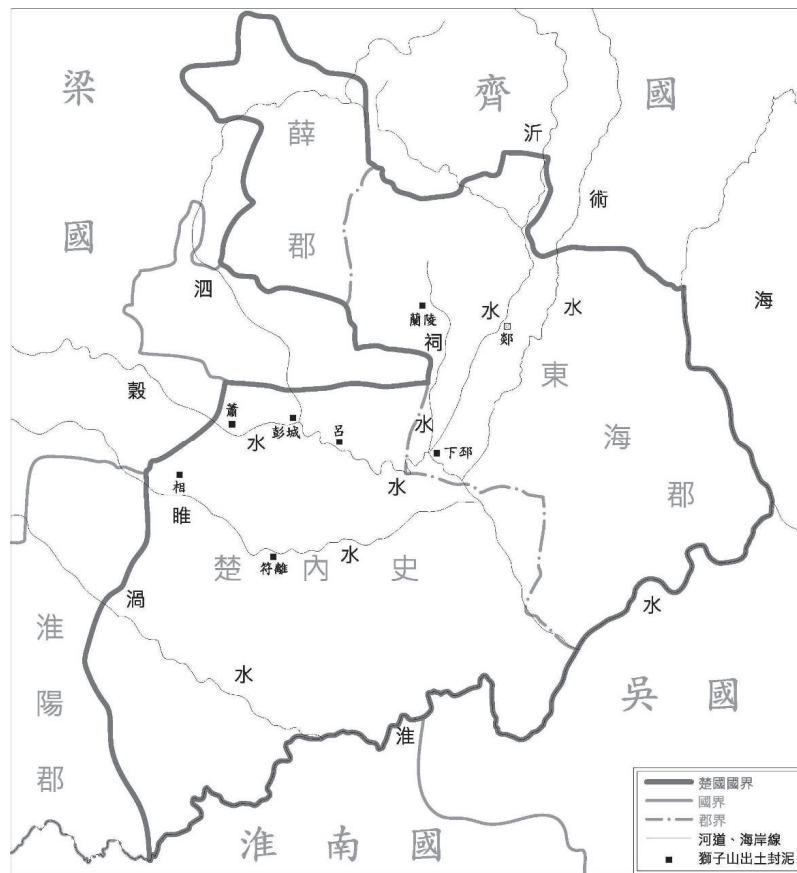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據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62，「文帝十二年——景帝元年楚國政界圖」改繪。

圖 4 土山出土封泥反映的漢初楚國政區圖



資料來源：據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53，「高帝六年楚國政區圖」改繪。

圖 5 獅子山隨葬封泥反映的楚國水路運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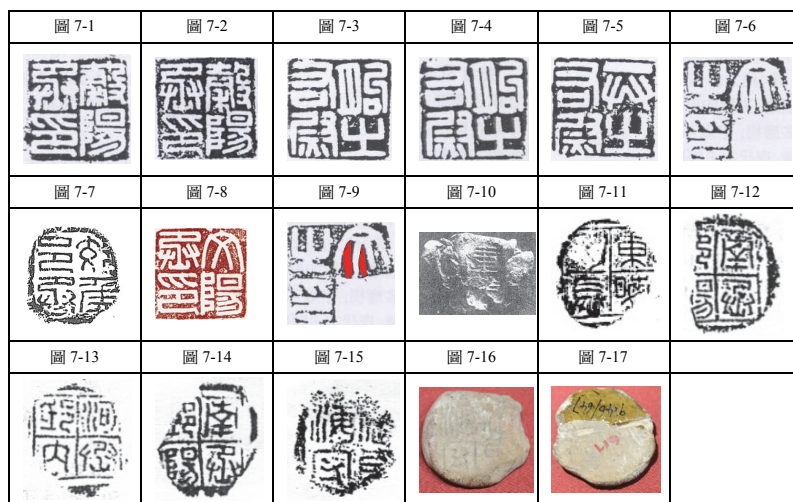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據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62，「文帝十二年——景帝元年楚國政界圖」改繪。

圖 6 楚王陵隨葬官印、封泥反映的楚國政區圖



資料來源：據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頁 57，「高帝十二年楚國政區圖」改繪。

圖 7 本文引用璽印、封泥的拓本或照片



資料來源：7-1、4、6、10，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頁 79-85；7-2 《北洞山報告》；7-3、5，王愷，〈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頁 44-47；7-7，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3324，頁 139；7-8，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編，〈大漢楚王〉，頁 76；7-9，改繪自圖 7-6；7-11，傅嘉儀編，〈秦封泥彙攷〉，編號 1229，頁 179；7-12、13，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頁 116-125；7-14，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頁 427-452；7-15，賈麥明，〈介紹幾枚漢代封泥〉，頁 93-94；7-16、17，2014 年 6 月 9 日劉瑞於西北大學博物館拍攝。

附表 秦漢銅印、封泥所見佩帶銅印郡吏表

官職	封泥							
郡守丞	汝南守丞 ²¹²	齊昌守丞 ²¹³	東郡守丞 ²¹⁴	南陽守丞 ²¹⁵	南海守丞 ²¹⁶	河南守丞 ²¹⁷		
郡尉丞	濟南尉丞 ²¹⁸	武威後尉丞 ²¹⁹	樂浪前尉丞 ²²⁰	日南尉丞 ²²¹				

212 已見 14 方封泥，皆出自汝南平輿古城村，見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4864-4877，頁 203-204。4876 號據形制斷代應為秦至漢初，其餘應為秦至西漢。馬驥，〈秦漢封泥封檢方式模擬實驗〉，頁 17-20；馬驥，〈西安新見秦封泥及其斷代探討〉，頁 322-327。《新出汝南郡秦漢封泥集》收錄封泥亦收入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本文不重複徵引。

213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706，頁 120。該封泥民初傳於山東出土，現藏於濟南市博物館，李曉峰、楊冬梅，〈濟南市博物館藏漢代齊國封泥考略〉，頁 414-424。王國維或疑為齊王屬官、或疑為齊悼惠王所置之「昌郡」，二說均惹人疑竇，王國維，〈《齊魯封泥集存》序〉，〈書《齊魯封泥集存》後〉，收入王國維，《觀堂集林》，卷 18，頁 570-575。其實《齊魯封泥集存》亦見「代郡太守章」、「琅邪都尉章」等時代晚於漢初齊國的封泥，若破除齊魯出土封泥當與齊國有關的先入之見，「齊昌守丞」的「齊」字不一定要理解為齊國之齊。「齊昌」一詞為古代吉語，南齊的豫州及梁州、北魏的北江州、隋朝揚州皆有「齊昌郡」，漢代曾有郡改名「齊昌」，遂留下「齊昌守丞」封泥，並非全無可能。

214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456，頁 74-75。

215 銅質鑲金，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652，頁 102。

216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939，頁 147。

217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705，頁 120。

218 銅印，孫慰祖訂為西漢早期至中期，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562，頁 90。

219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832，頁 130。「後」反映武威當時至少分前、後二尉，縣尉一般僅分左右，故「武威」較可能是郡，而非縣。

220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938，頁 146-147。

221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946，頁 148。

郡府丞	河外府 丞 ²²²	南郡府 丞 ²²³	上黨府 丞 ²²⁴	上谷府 丞 ²²⁵	蜀大府 丞 ²²⁶				
長史	上郡長 史 ²²⁷								
司馬	東海司 馬 ²²⁸	洞庭司 馬 ²²⁹	濟南司 馬 ²³⁰	豫章司 馬 ²³¹	東郡司 馬 ²³²	南陽司 馬 ²³³			
騎司馬	西海羌 騎司馬 ²³⁴								

222 已見 5 方，皆出自西安相家巷，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379-383，頁 16；陳偉，〈關於秦封泥「河外」的討論〉，頁 144-149。

223 已見 7 方，出自相家巷，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605-611，頁 26。

224 出自相家巷，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676，頁 29。

225 出自相家巷，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為秦封泥發現十周年而作〉，頁 311-321。

226 已見 7 方，出自相家巷，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741-745，頁 31-32。

227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733，頁 125。

228 出自相家巷，見傅嘉儀編，《秦封泥彙攷》，編號 1229，頁 179。該封泥(圖 7-11)釋文原作「東晦□馬」。王輝指出秦封泥「晦陵丞」即「海陵丞」，本封泥「東晦」應讀為「東海」；第三字殘畫似為「司」字，可讀為「東海司馬」。王輝，〈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續(六十則)〉，頁 527-557。

22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頁 180；朱晨，〈里耶秦封泥初探〉，頁 172-177。

230 銅印，孫慰祖訂為西漢早期，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563，頁 90。

231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737，頁 126。《兩漢官印匯考》未收。

232 孫慰祖訂為西漢早期，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734，頁 125。

233 出自相家巷，見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頁 311-321。

234 指西海郡的羌騎司馬。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820，頁 128。

馬官 / 丞	代馬丞 印 ²³⁵	衡山馬 丞 ²³⁶	西河馬 丞 ²³⁷						
司空	南郡司 空 ²³⁸	九江司 空 ²³⁹	泰山司 空 ²⁴⁰						
工 / 丞	巴左工 印 ²⁴¹	巫黔右 工 ²⁴²	蜀西工 丞 ²⁴³	河內左 工 ²⁴⁴					
織官	蜀左織 官 ²⁴⁵								

235 已見 8 方，出自相家巷。7 方藏於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與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館，見傅嘉儀編，《秦封泥彙攷》，編號 1220-1226，頁 177；1 方見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215，頁 9。

236 出自相家巷，見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頁 311-321。

237 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868，頁 136。

238 已見 2 方，分見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頁 253；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頁 265。後者出自相家巷，藏於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博物館。

239 出自相家巷，見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頁 265。

240 出自相家巷，見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頁 218

24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的發掘〉，頁 509-544。

242 出自相家巷，見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頁 116-125。

243 出自相家巷，見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頁 116-125。

244 出自相家巷，見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頁 116-125。

245 出自相家巷，見傅嘉儀編，《秦封泥彙攷》，編號 588，頁 87。

采鐵長 / 丞	汝南鐵長 ²⁴⁶	汝南鐵丞 ²⁴⁷	臨菑采鐵 ²⁴⁸	臨菑鐵丞 ²⁴⁹					
鹽官 / 丞	琅邪左鹽 ²⁵⁰	榑左鹽丞 ²⁵¹							
水官 / 丞	東海都水 ²⁵²	四川水丞 ²⁵³	清河水印 ²⁵⁴	汝南水長 ²⁵⁵	汝南水丞 ²⁵⁶	汝南水印 ²⁵⁷	南陽水丞 ²⁵⁸		
池官 / 丞	南郡池丞 ²⁵⁹								

- 246 出自平輿古城村，據形制斷代應為秦至西漢，見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4886，頁 204。參馬驥，〈秦漢封泥封檢方式模擬實驗〉，頁 17-20；馬驥，〈西安新見秦封泥及其斷代探討〉，頁 322-327。
- 247 已見 6 方，出自平輿古城村，據形制斷代應為秦至西漢，見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4879-4883、4885，頁 204。
- 248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2050，頁 345。《兩漢官印匯考》未收。鐵官為都官，一般屬郡或中央，故此處「臨菑」應是郡，而非縣。參唐俊峰，〈秦漢的地方都官與地方行政〉，頁 1-62。
- 249 「鐵丞」似為「采鐵丞」之省，見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2048-2049，頁 344。
- 250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2043，頁 343。鹽官為都官，一般屬郡或中央，故此處「琅邪」應是郡，而非縣。
- 251 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786，頁 123。據同書編號 784「榑為太守章」、785「榑為農丞」可知，「榑」即「榑」，乃「榑為郡」的省寫。《古封泥集成》釋為「榑鹽左丞」，誤。見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2044，頁 344。
- 252 出自相家巷，見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217，頁 10。
- 253 「四川」即「泗水」，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的發掘〉，頁 509-544。
- 254 出自相家巷，見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頁 311-321。
- 255 出自平輿古城村，據形制斷代應為秦至西漢，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4878，頁 204。
- 256 出自平輿古城村，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6353-6361，頁 265-266。
- 257 出自平輿古城村，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6362，頁 266。
- 258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653，頁 102-103。
- 259 出自相家巷，見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頁 311-321。

農令 / 丞	西河農 令 ²⁶⁰	代郡農 長 ²⁶¹	犍為農 丞 ²⁶²	隴前農 丞 ²⁶³					
庫令	上郡庫 令 ²⁶⁴								
均(輸)長	遼東均 長 ²⁶⁵								
發弩 / 丞	淮陽弩 丞 ²⁶⁶	衡山發 弩 ²⁶⁷	南郡發 弩 ²⁶⁸						
騎千人	安屬左 騎千人 269	文德左 千 人 270							
候 / 丞	上郡候 丞 ²⁷¹	恆山候 丞 ²⁷²	北地候 丞 ²⁷³	濟南候 印 ²⁷⁴	南郡候 印 ²⁷⁵	膠西候 印 ²⁷⁶	城陽候 印 ²⁷⁷	蒼梧候 丞 ²⁷⁸	豫章候 印 ²⁷⁹

260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867，頁 136。

261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909，頁 142。

262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785，頁 123。

263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812，頁 127。「隴」為「隴西郡」之省，「前」似乎反映當時有前丞、後丞之設。

264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2034，頁 342。

265 疑為「遼東均輸長」之省。見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2039，頁 343。

266 出自相家巷，見傅嘉儀編，《秦封泥彙攷》，編號 1448，頁 232。

267 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頁 254。

268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2047，頁 344。

269 指安定屬國的左騎千人。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824，頁 129。

270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841，頁 132。「文德」即「敦煌郡」，王莽更名。「左千人」即「左騎千人」。

271 出自相家巷，見傅嘉儀編，《秦封泥彙攷》，編號 1189，頁 173。

272 出自相家巷，見傅嘉儀編，《秦封泥彙攷》，編號 1230，頁 180。

273 時代訂為西漢，見韓自強，〈安徽阜陽博物館藏印選介〉，頁 88-90；周曉陸編，《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編號三-GY-0013，譜錄頁 309。

274 銅印，孫慰祖訂為西漢早期，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564，頁 90。

275 銅印，孫慰祖訂為西漢早期，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680，頁 106。

276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740，頁 126。《兩漢官印匯考》未收。

277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741-742，頁 126。《兩漢官印匯考》未收。

278 銅印，見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編號 940，頁 147。

279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745，頁 127。

武庫	恆山武庫 ²⁸⁰								
車令	代郡車令 ²⁸¹								
邸官 / 丞	參川邸印 ²⁸²	南陽邸印 ²⁸³	巫黔 ²⁸⁴	漢中底印 ²⁸⁵	河內邸丞 ²⁸⁶				

說明：本表係舉例性質，且盡可能排除郡、縣同名，無法確定封泥是郡吏還是縣吏之例。時代可能為秦及漢初的官印、封泥，以粗體標示。

280 出自相家巷，見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頁 116-125。

281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編號 2038，頁 343。

282 出自相家巷，見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頁 311-321。

283 出自相家巷，「邸」字僅存右半部(圖 7-12)，據「河內邸丞」的文例、拓本(圖 7-13)釋出，見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頁 116-125。學者曾公布「南陽郎丞」封泥(圖 7-14)，比較拓本、文例可知應釋作「南陽邸丞」。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頁 427-452。

284 出自相家巷，見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頁 116-125。

285 出自相家巷，見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頁 116-125。

286 出自相家巷，見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編號 376-378，頁 16。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王榮商，《漢書補注》，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第1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據光緒十七年刻本影印。

司馬遷著，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顧頡剛等點校，《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范曄、司馬彪著，李賢等注，宋雲彬等點校，《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

班固著，顏師古注，西北大學歷史系標點，傅東華校勘，《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1985。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

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附：三史拾遺、諸史拾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二、近人論著

卜憲群，〈秦漢之際國家結構的演變——兼談張家山漢簡中漢與諸侯王國的關係〉，收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館研究室編，《秦文化論叢》，第12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5，頁285-323。

大櫛敦弘，〈秦漢国家の陸運組織に関する一考察——居延漢簡の事例の検討から〉，《東洋文化》，68(東京，1988)，頁23-43。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臨淄齊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的發掘〉，《考古學報》，2001：4(北京，2001)，頁509-544。

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編，《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北

-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王子今，《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2014。
- 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 王國維，《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王愷，〈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文物》，1998：8(北京，1998)，頁 44-47。
- 王輝，〈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續(六十則)〉，收入王輝，《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頁 527-557。
- 王輝、程學華，《秦文字集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 冉如波、陳海霞，〈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其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2007：2(武漢，2007)，頁 58-64。
- 史念海，〈秦縣考〉，《禹貢半月刊》，76：7(北平，1937)，頁 271-318。
- 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 安志敏，〈金版與金餅——楚、漢金幣及其有關問題〉，《考古學報》，1973：3(北京，1973)，頁 61-90。
- 安志敏、安家瑗，〈中國早期黃金製品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報》，2008：3(北京，2008)，頁 291-310。
- 朱晨，〈里耶秦封泥初探〉，收入呂金成編，《印學研究》，第 2 輯(陶文研究專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頁 172-177。
- 宋治民，〈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的兩個問題〉，《考古與文物》，2000：1(西安，2000)，頁 22-28。
- 巫鴻，〈明器的理論和實踐——戰國時期禮儀美術中的觀念化傾向〉，收入巫鴻，《時空中的美術——巫鴻中國美術史文編二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193-208。
- 杉村伸二，〈二年律令より見た漢初における漢朝と諸侯王国〉，收入富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論考篇》，京都：朋友書店，2006，頁 21-40。
- 李春雷、李紅，〈徐州獅子山漢墓墓主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7：5(徐州，2007)，頁 29-33、82。
- 李銀德，〈徐州土山東漢墓出土封泥考略〉，《文物》，1994：1(北京，1994)，頁 75-80。
- 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印章與封泥概述〉，收入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編，《青

- 泥遺珍——戰國秦漢封泥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頁 9-29。
- 李銀德，〈徐州西漢楚王陵墓考古的發現與收穫〉，收入徐州博物館編，《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 3-12。
- 李曉峰、楊冬梅，〈濟南市博物館藏漢代齊國封泥考略〉，收入《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414-424。
-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收入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92。
- 辛德勇，《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 邢義田，〈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收入邢義田，《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380-449。
- 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353-361。
-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周振鶴，《漢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西北大學學報》，2005：4(西安，2005)，頁 116-125。
- 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 周曉陸編，《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0。
- 孟強、耿建軍，〈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執墓〉，《文物》，1997：2(北京，1997)，頁 4-21。
-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中国の封泥》，東京：二玄社，1998。
- 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馭籃山西漢墓〉，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學年鑑 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 173-174。
- 阿部幸信，〈前漢時代における内外觀の変遷——印制の視点から〉，《中国史學》，18(東京，2008)，頁 121-140。
- 阿部幸信，〈漢初「郡国制」再考〉，《日本秦漢史学会會報》，9(東京，2008)，頁 53-80。
- 南京博物院，〈銅山小龜山西漢崖洞墓〉，《文物》，1973：4(北京，1973)，頁 21-35。
- 洪尚毅，〈漢代的塞尉與城尉——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西北邊塞漢簡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 范正紅，〈西漢「臨淄丞印」封泥同文異印現象探討〉，收入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編，《青泥遺珍——戰國秦漢封泥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

- 印社出版社，2010，頁 142-146。
- 韋正，〈江蘇徐州市獅子山西漢墓墓主的再認識〉，《考古》，2002：9(北京，2002)，頁 86-92。
- 韋正，〈從出土印章封泥談漢初楚國屬縣〉，《考古》，2000：3(北京，2000)，頁 75-80。
- 韋正、李虎仁、鄒厚本，〈江蘇徐州市獅子山西漢墓的發掘與收穫〉，《考古》，1998：8(北京，1998)，頁 1-20。
- 唐俊峰，〈秦漢的地方都官與地方行政〉，《新史學》，25：3(臺北，2014)，頁 1-62。
- 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2。
- 孫慰祖主編，蔡進華、張健、駱錚編，《古封泥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94。
- 孫慰祖編，《兩漢官印匯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 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徐州北洞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8：2(北京，1988)，頁 2-18。
- 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編，《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徐復觀，〈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收入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 1(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163-202。
- 耿建軍，〈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墓開鑿時間考析〉，《東南文化》，2000：3(南京，2000)，頁 73-77。
- 耿建軍，〈試析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質〉，《考古》，2000：9(北京，2000)，頁 79-85。
- 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馬驥，〈西安新見秦封泥及其斷代探討〉，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第 11 輯，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322-327。
- 馬驥，〈秦漢封泥封檢方式模擬實驗〉，收入王玉清、傅春喜編，《新出汝南郡秦漢封泥集》，上海：上海書店，2009，頁 17-20。
- 高震寰、蔡佩玲、張苙、林益德、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譯注〉，《史原》，24(復刊第 3 期)(臺北，2012)，頁 295-352。
- 張守中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張忠偉，〈《二年律令》的施行地域〉，收入張忠偉，《秦漢律令法系研究初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59-71。
- 張龍海、張愛雲，〈山東淄博市臨淄區齊國故城出土漢代封泥〉，《考古》，2006：9(北京，2006)，頁 91-92。

- 曹學群，〈吳氏長沙國歷史地理四題〉，收入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2輯，長沙：岳麓書社，2005，頁420-426。
- 梁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與墓主問題的再認識〉，《考古》，2006：9(北京，2006)，頁78-82。
- 陳偉，〈包山簡所見楚國的宛郡〉，收入陳偉，《新出楚簡研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頁1-7。
- 陳偉，〈關於秦封泥「河外」的討論〉，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44-149。
- 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為秦封泥發現十周年而作〉，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第11輯，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311-321。
- 陳蘇鎮，〈漢初王國制度考述〉，《中國史研究》，2004：3(北京，2004)，頁27-40。
-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收入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陳槃等校訂增補，《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300-301。
- 傅嘉儀編，《秦封泥彙攷》，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游逸飛，〈西漢郡國雙軌制再探——官僚制與封建制的結合〉，收入《中國中古史研究》編委會、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27-57。
- 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郡吏補考〉，收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頁261-271。
- 游逸飛，〈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7。
- 湯其領，〈漢初楚王國官印與職官探蹟〉，《韶關學院學報》，2007：10(韶關，2007)，頁75-79。
- 黃展岳，〈漢代諸侯王墓論述〉，收入黃展岳，《先秦兩漢考古與文化》，臺北：允晨文化，1999，頁310-338。
- 黃盛璋，〈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墓主與出土印章問題〉，《考古》，2000：9(北京，2000)，頁69-78。
- 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北京：紫禁城，2001。
- 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 獅子山楚王陵考古發掘隊(王愷、邱永生執筆)，〈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發掘簡報〉，

- 《文物》，1998：8(北京，1998)，頁 4-32。
- 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漢墓年代與墓主探討〉，《考古》，2009：9(北京，2009)，頁 81-89。
- 葛明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墓主為劉戊考〉，《東南文化》，2012：4(南京，2012)，頁 71-80。
- 賈麥明，〈介紹幾枚漢代封泥〉，《文物研究》，1985：1(合肥，1985)，頁 93-94。
- 趙平安，〈對獅子山楚王陵所出土印章封泥的再認識〉，《文物》，1999：1(北京，1999)，頁 52-55。
- 趙立新，〈西晉末年至東晉時期「分陝」政治——分權化現象下的朝廷與州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劉創新編，《臨淄新出漢封泥集》，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05。
- 劉尊志，〈徐州兩漢諸侯王墓研究〉，《考古學報》，2011：1(北京，2011)，頁 57-98。
- 劉尊志，《徐州漢墓與漢代社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 劉照建，〈徐州楚王山漢墓時代和墓主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10(北京，2012)，頁 6-18。
- 劉照建、張浩林，〈徐州獅子山漢墓墓主考略〉，《東南文化》，2001：7(南京，2001)，頁 26-30。
- 劉照建、梁勇，〈徐州市銅山縣楚王山漢墓群考古調查〉，收入《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247-254。
- 劉照建、邊策，〈也談北洞山西漢楚王墓的墓主和時代〉，《東南文化》，2010：3(南京，2010)，頁 59-62。
- 劉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封泥考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二十一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大會暨二十一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425-436。
- 劉瑞，〈獅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收入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550-560。
- 劉瑞，〈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墓主考〉，收入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537-550。
- 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 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學報》，2001：4(北京，2001)，頁 427-452。
- 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7。

- 鄭宗賢，〈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早期中國史研究》，3：1(臺北，2011)，頁 1-67。
- 鄭威，〈西漢東海郡的轄域變遷與城邑分布〉，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 25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171-188。
- 閻步克，〈若干「比秩」官職考述〉，收入閻步克，《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級結構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408-432。
- 韓自強，〈安徽阜陽博物館藏印選介〉，《文物》，1988：6(北京，1988)，頁 88-90。
- 羅福頤，《古璽印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羅福頤主編，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璽印組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藤田勝久，〈《史記》與漢代諸侯王——《張家山漢簡·秩律》與徐州楚王陵印章封泥〉，收入北京市大葆臺西漢墓博物館編，《漢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頁 475-484。
- 藤田勝久，〈張家山漢簡〈秩律〉と漢王朝の領域〉，《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28(松山，2010)，頁 1-32。
- 藤田勝久，〈漢代の漕運事業と郡県社会〉，收入藤田勝久，《中国古代国家と郡県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05，頁 340-378。
- 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2 冊(秦、西漢、東漢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
- 徐州博物館編，《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 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變〉，收入《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172-193。

三、網路資料

- 游逸飛，〈《二年律令·秩律》簡 444「二千石口丞」應釋作「二千石官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79，瀏覽日期：2013 年 8 月 14 日。

There Was No Commandery in Chu Kingdom during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Case Two on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of Early China

Yi-fei Yo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Chu kingdom's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history, we identified the Beidongshan and the Shizishan tomb owners as the first and second Chu kings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More than two hundred official seals and thousands of lute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y have been found in tombs, but no official seals and lutes of the commandery of the Chu Kingdom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After excluding other possibilities, most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re were no commanderies in the Chu kingdom at this time. Such evidence as there is came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Han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reflected only the beginning, but not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each kingdom. We must critically review the time and region of the sources, in order to get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there were in fact commanderies in kingdoms during this period.

Scholars have believed that the Qin and Han central governments generally set up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in All-under-Heaven. Actually, the Han central government did not set up commanderies but only counties in All-under-Heaven. Compared to the feudal system,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beneficial to centralization. However, the Han kings did not find that commanderies were beneficial to centralization, and so they abolished commanderies. That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beneficial to centralization is simply post facto dogma. Although the kings' abolition of commanderies was a localized and specific phenomenon, it helps us to rethink the nature of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not as a tool of centralization but precisely a potential tool of decentralization. This topic is small, but it may foster a new vision to reinterpret the na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

Keywords: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kingdom, seal and lute, Chu king's tomb in Xuzhou, Beidongshan, Shizishan